



“文革”中认识的陈翰老伯

许本道

一、茶陵干校

在湖南湘东某地，曾有一个名叫“虎踞公社”的地方。此地属丘陵地带，土质老黄，山上树木无几，乱坟、杂草丛生。平时，这里行人稀少，举目一片荒凉。据传，此地自古常有老虎出没，故称为“虎踞山”。

1969年，这个偏僻的山乡，突然沸腾起来，许多“登”山运动员来了！其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全是外地人。他们是响应“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不远千里而来，并在此办起了一所“五七干校”。一年四季，无论是炎夏或寒冬，他们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垦荒，种菜，虎踞山上到处都洒下了他们的汗水，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我有幸相识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师长，他就是中国历史学家陈翰笙老伯。20多年来，他老人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爱护我，教育我，他老人家为人高尚的品德，使我终身铭刻难忘。



二、医院相逢

1970年3月，春雨绵绵，一辆卡车从茶陵干校载着一位七旬高龄的老人，驶进了攸县人民医院……“春雨绵绵泥浹黄，沿途清水满池塘，卡车载我过北市，徒步就医入病房！”这是陈老伯入院就诊时写的一首诗。当时我父亲患病住院，正巧，陈老伯与我们同住一病室。这个病室里共有四个病号，最年长的要算陈老伯了。其中有一个是攸县乡下的农妇，约50多岁。另一个是湖南某市法院的干部，他姓赵。农妇由她的女儿和儿媳轮流照料。

曾有算命先生说我千里有贵人。现在想起来我和陈老伯还是有缘份的。在攸县人民医院，我和陈老伯一见钟情，情投意合。我最乐意亲近他老人家，他也常常和我们聊家常。他老人家慈祥，厚朴，宽容的个性，深深地感动着我。记得有一次，当班护士拿来了一瓶从国外进口的“西林”油药剂，准备给他作肌肉注射。药瓶说明全是外文，老伯一看这瓶药剂有效期已过，不能再使用了。可是他老人家并没有因此而责怪护士和医师，只是再三嘱咐他们“这药有效期已过，不能给我用，更不能给别人用啊！”陈老伯关心他人胜过自己。又有一次，农妇的女儿要上街买肉做汤圆给他母亲补身体。此时雨下个不停，又没有伞，陈老伯得知后，立即拿出一把精制的纸伞，借给她，可是一借无还。农妇的女儿要走了，他老人家还不过问。陈老伯身体康复，即将出院了，有一天，他老人家不知从哪里拿来一把栗子扫帚，执意要把病室打扫干净，一扫，竟从他床铺下扫出了那一把纸伞，撑开一看，已被弄坏了（这把伞被弄坏后，是农妇的女儿偷偷地将它放进床底下的）。陈老伯微笑着说：“本道，你看，手足笨重，没有办法。这把伞是别人借给我用的，如有同样的，我购一把还他才好。”他老人家多么宽容啊！

陈老伯要离开我们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和我父亲谈心，



依依不舍。他告诉我们，他是江苏无锡人……他老人家还拿出二十元钱，执意要我们收下买些吃的，给我还在病中的父亲补充营养。我们婉言谢绝了。他对我的双亲说：“你们的孩子很有教养。”我想陈老伯这么高龄，身在异乡，举目无亲。平时我给他老人家端点热饭，打些热水或跑腿去买点什么，这对一个年青人来说是不费劳累的事，是微不足道的。陈老伯要离开我们了，我心里很难过，我恨不得他老人家能在医院和我们多住些日子。真是相见时难别也难啊！我对他老人家说了我的心愿——我要送他回干校。陈老伯微笑了。我家离医院来往四华里有多，有一天，他老人家从医院步行来我家，我们要给他弄点什么吃的，他执意连水也不肯喝一口就走了。就在我回家给我父亲捎饭的时刻（因医院伙食较贵，我父亲住院时，每天三餐都是由家里做饭送去），干校来车接他出院了，我很难过。我想，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送一程呢？一星期后我接到了他从干校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和一张20元钱的汇票，此时我才明白那天他来我家的用意，是看看我家的住址和门牌号码。他老人家对我们全家的一片深情厚意，我们再也不能推辞了。

三、虎踞探亲

1970年端午节的前几天，我从攸县网岑干校商店（当时我在此做临时工）带回几斤白糖，我的双亲另购了两件棉绸布料（一件是棕色的，一件是茶色的），我们将白糖全装在一个我家使用了几十年的陶瓷缸里。我要拜访他老人家了。从攸县城关至茶陵干校有30华里。记得那天天气晴朗，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我沿着通往茶陵方向的公路走去。五月的太阳，也觉得有些晒人，我流汗了。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一一奔驰而过，一股股黄色的泥灰，随风扑面而来，我顾不了这些，一个劲地往前走，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茶陵干校。出现在眼前的是，山梁上，山坡下，方圆都是一片



片绿油油的茶树，有些人在地里干活。我本想前去询问，一位大约30多岁的中年妇女先开口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陈翰笙老伯。”你是他什么人？找他干什么？我说：“我是他的朋友，特意来看望他。”然后她指着一个矮小的平房说：“他在那儿。”我走进矮房，只见陈老伯独自呆在屋里。这房子并不宽敞，共设有四张单人床，左右各两张。房子里中间的通道很窄，显得拥挤。我问候了他老人家，可我要他收下这些东西时，他老人家有些生气了，他说：“你们湖南有这样谢礼的风俗吗？”我说：“你老人家看我跑了这么远的路是多难的，请你收下我们这小心意吧。”随后他勉强收下了一件蓝色的棉绸料和这一缸糖。一会儿，他老人家又搬来一条矮木凳，靠床边站上去。我看那床顶上有书，还有些零乱的东西。他从其中拿下一个破旧的小竹箩，拿出几包葡萄糖，说：“本道，这葡萄糖是我外甥女邮来的。你身体消瘦，要吃些营养。你带回去用吧。”此时此地，他老人家可曾想过自己，可曾想过他的亲人，尤其是和他老人家相处几十年的家室，我想这葡萄糖饱含着他老人家亲人的一片相思和牵挂，饱含着他老人家亲人的一片骨肉之情，我怎么能收下呢？止不住的热泪滚滚流下来了，我不知道是咸、是酸，还是苦。陈老伯他老人家却太固执了，如我不收下这几包葡萄糖，就要我把东西带回。我违心了，他老人家让我收下了这一份我不应该受的情。我要走了，他老人家再三嘱咐：“本道，我这里不缺吃的，以后来不要破费带东西啊！”

我在攸县网岑干校商店做了一年多的临时工，那时候市场上有些物资很缺，要吃糖都要找人批条子，还发什么计划糖票的。因为我是搞这个行业，自己要用就不必求人。我知道陈老伯他老人家喜欢吃糖（尤其是片糖），因此，我经常地捎带些食糖去干校看望他老人家。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能吃上一些食糖也就是陈老伯他老人家最高的生活享受了。



四、访师传艺

我全家一共七口，父亲在攸县某单位工作，母亲料理家务。我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我父亲微薄的收入养活。由于家境贫寒，无钱读书，我刚刚念完小学就失学了……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青年，在社会上要找一个适当的职业可就难了。陈老伯很同情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的前途，他常常来信询问我的情况。他老人家不顾自己七旬高龄，四处奔波，为我找了一位名叫陈文明的木工，要他带我学艺。他老人家负担我的进师费及三年学徒期间的生活费用。后因我就业于攸县硫化碱厂，未学。但是，他老人家对我的一片厚爱，我是终身铭刻难忘。

我曾想见见这位陈文明师傅。我走访了原干校周围的双园、黄坪等几个大队（现改称为村），在湖北找到了一位年纪19岁的小木工，他也叫陈文明，在黄坪牛拉塘生产队（现改为组）找到了一位年已50多岁的木工，他名叫谭曼苟。他对此地情况比较熟悉。但他也不知道有个叫陈文明的木工，这也只能日后慢慢查访了。

五、京地邮书

陈老伯于1971年6月从茶陵干校返京后，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和学习，关心着我们全家。他老人家常常给我们邮来剪报和书籍，并来信勉励我学习上进。他老人家给我莫大的教益和鼓舞。

我只念过几册书，文化素质很差。我每次给他老人家写信时，尽管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提笔又觉得很吃力。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记得我刚刚给陈老伯写信时，错字病句很多。他老人家总是将我信中的错别处一一作了修改，有时连标点符号也改了过来。随后他又将这些信一一邮还给我，让我自己认真去思考和



学习。记得有几次通信中，他老人家批评我写字不认真，他说：“一字写的分开，看上去是两字了……又是‘千里迢迢，书信回笼’了”。正是有了这一“回笼”。使我能知道我学习中的缺点，并努力去改正它。为了帮助我进步，陈老伯还给我邮来了一本汉语字典。我深深体会到他老人家是多么关心和爱护我啊！

陈老伯很理解年青人。凡是有益身心的事，他老人家都给予支持。我兴趣医学，很想做中医。他常常勉励我努力学习，学习中医，学习《中医汤歌》是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此书原版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我曾去信向他老人家求援，陈老伯很快给我复函了。他说：《中医汤歌》托人去找寻，至今还未得结果，当再托其它方面去找……”他老人家曾给我妻朱秀英去信说：“本道同志现在到老中医处学习否？请劝他早点学习，还可做中医。”“昨又接本道来信，欣慰正在中医学方面用功。很高兴。”我深深体会到陈老伯对我的一片厚爱。

在漫长的岁月里，陈老伯对我们全家都给予了关怀。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是请他老人家取名的。他在一次来信中说：“希望秀英同志在家多事休养，勿急于返回学校。来函要我为你们的孩子取名。我想如果为女孩取名，可用小英二字。如果是男孩取名，可用承志二字。这小英是同母亲名字相连的；承志是同父亲名字相连的。本道即本道义而行事之意。承志就是继承这种道义。”此后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正巧是一男和一女。现在小英在上初中，承志已念高中。她（他）们从小长大到现在，身体都很不错。我想这也是托陈老伯他老人家的福了。

陈老伯自1971年6月从茶陵干校返京后，他老人家曾先后赠送我们三张照片。每每看到这些照片，就好像看见了他老人家。我多么想能让我们的孩子看望看望他老人家。



我所认识的陈翰笙教授

任雪芳

听人说到陈翰笙的名字，大概是在1979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商务印书馆也准备恢复出版原来由吴晗先生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决定请陈翰笙先生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室的编辑，我听人谈起了陈翰笙：那可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李大钊介绍他入党；与三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有着不寻常的交往，是路易·艾黎的挚友；与宋庆龄关系密切，书信不断；二战中，为革命工作奔走于海内外；周恩来总理请他回国当外交部副部长，他硬是不干……这样一个神秘的大人物，使我景仰，令人敬畏，我急切地想见见他。

两个月后，一天，一位老编辑说要带我去见陈翰老，就手头的一部书稿中的问题向他请教。我既紧张又兴奋，随着老编辑走进了东华门附近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四合院，在一间摆放着老式写字台和书柜的普普通通的房间里，见到了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矮个子老人。陈翰老亲切地问我的名字，说以后我们就要常在一起工作了，很欢迎，趁着老编辑与翰老谈工作，我忙打开书包，想拿出书稿准备一下，哎呀，要谈的书稿竟忘记带来！

可是，半天下来，我的拘束感完全消失了，在陈翰老的启发下，我敢于发表自己对书稿的看法，畅谈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我们谈了很多，记忆最深的是他讲不要把历史看得那么神秘、遥远，



对于今天来讲，昨天就是历史；我们不要写人家写烂了的东西，而应该写读者最想了解、而人家又写得少的选题。他那敏捷的思维、机智的问答、风趣的语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是位80多岁的老人！老人一本正经地说：“我还只有28岁（82岁倒说），年轻着哪，你看我可以蹦呵！”说完，真的站起来跳了两下，逗得我哈哈大笑。

这以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陈翰老家一次，与他共同研究选题、审查书稿。越接触多，对他的了解越多，也就越感到他的可敬可爱：本世纪30年代，为了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以确定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陈翰老领导调查组在无锡、广东、保定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写出一批有影响的专著，以确凿的材料证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关于“农村复兴”的谎言，为我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香港主编了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外严密封锁消息，《远东通讯》却立即报导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1951年，陈翰老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回国，周总理请他做外交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吃中餐用筷子，吃西餐用刀叉，我是一个筷子料，不要拿我当叉子用。总理，还是让我搞点研究工作吧！”于是，他着手筹建了英文版《中国建设》，领导了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文革中，他身遭迫害、老伴惨死。从干校回来后，看到教育事业受冲击，许多青少年，尤其是父母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就不顾双目“一青二白”（青光眼、白内障）而毅然开办英语学习班，免费教育少年学习外语，其中包括“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两个女儿。他顶住种种压力，从1972年到粉碎“四人帮”四年时间，共收学生130多人……这一切，使老人的形



象越来越高大，使我产生了为之树碑立传的想法。

1984年春天，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朋友邀请我参加陈翰笙传的撰写工作，使我有机会连续三个月，每周两个半天坐在翰老身边，听他娓娓动听地讲述他那坎坷、传奇的人生之路。后由于一些原因，传记的撰写工作停顿下来。我十分着急，认为写翰老的传记，不是单为他个人树碑立传，而是通过传记，反映出他所处的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因此，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88年完成了陈翰笙传——《四个时代的我》，并在全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感到欣慰，尽管传记尚存在太多的不足和遗憾，但像陈翰老这样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总算有了一个“小传”。今后，有机会我将去台湾，找回当年被劫往基隆的陈翰老的宝贵日记、书信等等，届时，我将写出一本更全面、更丰富、更能反映陈翰老风范的“大传”。

我要着重说的是，作为中外著名的学者、专家，陈翰老对给青少年看的这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却耗费了无数的心血：从1979年12月至1990年10月，他审过296部书稿；他注意平衡丛书的选题，建议增加亚非拉国家的选题，并推荐了有关学者增补为编委；针对丛书出版、发行中的弊端，他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跃邦，引起了领导同志的重视，并采取了一定的解决办法。目前外国历史小丛书已基本出齐，计480多个单行本，48个合集，许多书已被选入共青团中央选印的“少年文库”、“青年文库”和“希望书库”，相信今后这套全国独一无二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陈翰老一贯重视对年青人的培养教育，这点我深有体会。就说英文班吧，从1972年一直办到90年代初，一直没间断过。一般是两个班交叉进行，星期天也从不休息，先后有数百个青年，甚至中年人，从陈翰老处无偿地学到了地地道道的英文。他经常问我：“商务印书馆有没有人学习英文，你们编辑室有没有人学习英文阿？你要给我推荐人啊！”商务印书馆也确有七八个人去翰老家



学过英文，均受益匪浅。陈翰老教学生用的教材，都是自己从中外名著、报纸杂志上摘编的，内容涉及五大州各国的政治、历史、教育、社会风俗各个方面。这样，学生既学习了英文，也同时熟悉了外部的世界。这些精湛的教材，后来编为《英美短篇时文选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近20年来，我们编辑室的新老编辑们，都去过陈翰老家，与他共同探讨、审查过书稿，他那诲人不倦的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一丝不苟的作风，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我们今生有幸，能在陈翰老的身边工作、学习！

陈翰老与商务印书馆同龄，青年时代就与小他六天的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读商务出的书，作过商务的编辑，成为商务的作者，被聘为商务丛书的编委、主编，教商务的人学习英文……今天开会庆祝陈翰老百岁诞辰暨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可以告慰翰老的是，丛书将于今年出齐，翰老与商务的不解之缘，也将功成圆满！



陈翰笙与史沫特莱和佐尔格

江 枫

比我们这个世纪还要年长些的陈翰笙先生，也就要比21世纪提前几年开始他个人新的一世纪了。

如果从美国回到北京，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接受了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要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建议，他后来的生活状况肯定会有所不同，甚至很可能是大不相同，但是他谢绝了，他认为他“不是做官的材料”，他更愿做他熟悉和能够胜任的工作。

现在回顾他确实是一步一步走过了的人生道路，我们会承认，这条虽不显赫，却仍然是比任何一条爱国者的道路都毫不逊色，至少是同样光辉的道路，实在是任何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有理由认为不虚此生而引为自豪的道路。

更为人们熟知的是陈翰笙作为一名学者的成就，但是历史也不该忘记他作为一位勇敢机智、忠于理想的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作为革命者，陈翰笙从1925年经李大钊和加拉罕介绍加入第三共产国际以后便开始了20多年出生入死、有惊有险的工作和生活，从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推断，他的地下秘密工作也像他公开的学术活动一样卓有成效，而他这方面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和史沫特莱、佐尔格的活动重叠在一起的。

史沫特莱在她那部被公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报告文学著作



《中国的战歌》第一章（中译本，第71~76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几星期以后，有一位研究农村情况的学者来到南京，经官方批准，他要到京沪之间的一个地方去作调查。他邀我同行。大约一年前，那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暴动，有四十个农民被杀死在一个极有权势的地主的庄园里。

“我们等到秋收季节，在无锡登上一条汽艇……沿大运河北行。真像是命运的安排，那位极有势力的大地主恰巧也在船上……他姓朱。

“朱先生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我们接受了。我的学者朋友体质羸弱，处事谨慎。他说，如果我们拒绝，就很可能进不了那个地区。”

在详细记述了朱姓地主庄园的见闻之后，她对这位学者朋友写出了以下这样一段评语：

“他，和像他这样的一类，是我所遇到的革命民主派。他们和那些精神贵族一样，也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也汲取了西方教育的精华。不同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头脑用来服务于人民。”

史沫特莱在这里所说的“精神贵族”，是指胡适和徐志摩等人，而这位用头脑为人民服务的学者朋友，就是陈翰笙。

在有关“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一节，史沫特莱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天下午，有一位中国女朋友，在去出席中国最高层官员之一郭泰祺的夫人所举行的一次茶会时，顺路来看我。她正在为孙逸仙夫人主持的、收容了一千名伤兵的一家医院募集捐款和志愿工作人员。我在她的募捐簿上签了名，而且捐了一点钱。她从茶会回来时把会上的见闻告诉了我。茶会来宾都是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的妻子和女儿……这些女人打麻将赌博，一场输赢总有几百元。当她们赌兴正浓时，我的朋友提出了捐款的请求。那些女人看见捐册上名列第一的是我，而我只捐了二十元，也就每人各捐二十，一文不多一文不少。”



她的这位中国女朋友，就是陈翰笙的夫人顾淑型女士。

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又不仅仅是朋友；史沫特莱不是共产党员，却是真正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称她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茅盾说“她是我所遇到的透彻到家的国际主义者”。

·麦金农在他撰写的《史沫特莱传》中指出，“史沫特莱在把握自己和把握中国现实两方面，在1929年秋，都取得了坚实的进展。在此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位是当时新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翰笙……”^①

据陈翰笙自己回忆，“我到上海不久，大约是1929年2月，就在宋庆龄的住处认识她了。”“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情况不熟悉，要求我帮她的忙，于是我们有机会经常在一起谈谈。九一八事变那天……我们谈了很多，谈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际法西斯的猖獗，一致认为正直的人都应该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这时我不知道史沫特莱是在为第三国际工作，她也不知我是第三国际的，然而对和平、进步事业的关注，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事实上他们全都在为当时在政治上代表着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有组织进步力量的第三国际工作，这个“他们”也包括宋庆龄——她在第三国际的中国活动领域内享有崇高的声望和极高的权威。

史沫特莱在中国，为了劳苦人民的解放事业，全力以赴、无所不为，陈翰笙在公开的活动和秘密的工作两方面给了她全面的帮助和合作。他们之间的友谊曾经深厚到使得史沫特莱产生过要和陈翰笙谈婚论嫁的念头，但是陈翰笙告诉她，“我已经结过婚了”。

“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陈翰笙说，“我又认识了传奇式人物里哈尔德·佐尔格。他的祖父弗里德里赫·佐尔格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挚友。佐尔格早年投身革命，为第三国际和苏联做情报工



作，1929年来中国，公开身份是（《社会学报》的记者——笔者）经济学家，来中国研究银行业务。实际上，他在搜集国民党政府武装力量的资料，观察最高指挥部的人事变化。他活动能力很强，到中国不久，便通过（正在帮助蒋介石剿灭中国工农红军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结识了何应钦，并被引见给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正廷。”

佐尔格已被公认为“世界间谍史上最了不起的谍报人员”，他在中国的成就，在出色地完成他本职任务的同时，还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效地进行反围剿战斗的重要情报来源，但是他的工作原则却是不同驻在国共产党组织和成员发生直接联系。

德国的传记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在他的《佐尔格的一生》中写道，“佐尔格在中国干了三年的谍报工作，没有享受过一次休假。他在中国的行程相当于绕地球走了四分之一圈。在这三年时间里，研究了中国古老的经济和新兴的历史及其经济和文化，并对中国的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无疑，史沫特莱能够介绍给他而在这些方面作出贡献的，也只有陈翰笙有条件被佐尔格以赞赏的口吻承认为“competent”——能干的、胜任的、称职的。

从1929年到1932年，“佐尔格及其侦察小组（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帮助”，曾把有关于诸如“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南京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三次进攻”的情报，通过史沫特莱和当时也在上海的另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德共党员格哈德·艾斯勒通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夏季，佐尔格在工作上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桂林的一次会议上，（德国军事顾问）格奥尔格·魏策尔将军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们拟定了对鄂豫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战略计划。佐尔格立即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这次围剿的进攻方向、兵力和部队的集结和日期、魏策尔想要用来消灭红军的‘掩护战略’（所引译文如此——笔者）的中心内容，向总部作了报告。



中国红军得到情报后，立即转移到西北地区，这完全出乎国民党战略家们的意料，使他们企图一举消灭那里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莫斯科对佐尔格在中国的工作成绩非常满意，因而后来决定派他到日本去执行更加艰巨、更加重要的任务。他在中国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和陈翰笙的合作和贡献分不开的。

1941年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涉及1930~1932年中国活动的部分写道：

“我……来到中国后，在上海能够依靠的只有史沫特莱一个人，我最初是在欧洲听人谈到她的。我请她帮助我在上海成立一个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几个中国合作者。我尽可能多地会见她的年轻中国朋友，下功夫去结识志愿和外国人合作以促进左派事业的那些人。我发现了一个能胜此任的人才，便决定用他做我的翻译，逐渐和他熟悉到了可以交谈而不必有所保留的地步。经过两三个月的合作，我对他扼要说明了我的目的，请他和我一道工作。我还请他把他的亲戚朋友中合适的人介绍给我。我把这位中国合作者叫作‘王’，再加上他的妻子，就成了我这一小组的第二个成员……”

在证词中被他称作“王”氏夫妇的，根据所有已知的各种有关情况判断，只可能是陈翰笙夫妇。^②据当时也在上海和佐尔格一起工作过的张文秋，也就是史沫特莱笔下专文描写过的那位“单菲”女士证实，陈翰笙和佐尔格合作时的化名果然姓王，叫王如卿。

“像以往一样”，佐尔格说，“我喜欢把我的讨论限制在我直接与之打交道的极少数中国人之间。在上海，我主要是和王一起工作，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找其他成员。王把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和情报带来，我们便一道讨论。如果交来的情报和资料有必须加以说明或是补充报告的，便由他和我同提供者谈。我有关于情报收集的指令和要求则通过他转达……”



除在上海和南京，陈翰笙还在旅行外地时充当佐尔格的翻译和向导。陈翰笙曾陪佐尔格到广州作调查，伴送他到西安去见杨虎城的秘书南汉宸，而且，为他开展工作而介绍过例如孙冶方那样的。

“佐尔格认识我之后”，陈翰笙回忆道，“又要求我给他介绍可靠的年轻人。那时我与孙冶方很熟，就与他讲了，要介绍他与佐尔格相识。有一天，我与佐尔格在楼上说话，事先嘱咐孙冶方在楼下等着。不大一会佐尔格在前、我在后从楼上下来。孙冶方一见，没等我介绍，就先用俄语讲了起来。佐尔格一声不响走了，后来告诉我以后不再和孙见面。原来，佐尔格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在公开场合只讲德语、英语，不讲俄语”。

1933年秋佐尔格来到日本。佐尔格在东京的工作小组，核心骨干如尾崎秀实和克劳森夫妇等全都是在上海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结识和结合的，陈翰笙也曾应佐尔格之邀前往东京。“1934年冬天”，陈翰笙说，“佐尔格通过史沫特莱动员我去东京，为第三国际做些工作”。显然，这时的陈翰笙并不知道佐尔格已从第三国际调到苏联红军的情报部门，但是在那个时代，为苏联也就是为共产国际，为共产国际也就是为苏联，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完全一致。

接下去，他继续说道，“我同意去日本，表面上说是去东洋文库做研究工作”。“我同顾淑型到东京，找了间房子住下来，即去东洋文库研究经济”。

在东京的一年里，他用英文写成了两部经济学论著。但是对于佐尔格来说，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是个更重要的情报来源。于是，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或是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掩护下，他说，“我受佐尔格的委托，在东京主要是在满铁株式会社做日本人的工作，尾崎秀实帮了我的忙”。

尾崎秀实曾经是大版《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曾是史沫特莱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和鲁迅有过深厚的友谊，在鲁迅的日记



里被称作“欧札机”——这是他在中文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中文笔名，其实也是“尾崎”这两个汉字作日语训读的音译——1932年2月初回国，翻译出版了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后来以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声誉当上了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成员和私人顾问。佐尔格则由于有高超的时事洞察、分析能力和纳粹党证而在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内受到大使和武官特殊的信任，以至得以与闻机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德、日两国决策。

佐尔格小组在事发前四个月就向莫斯科发去的有关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虽然未能得到斯大林应有的重视，但是，关于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南进、向英美开战，而不是配合德军夹击苏联——由于要核实而直到10月初才能准确无误发出的报告，却使得苏联敢于把远东地面部队将近一半的兵力在朱可夫的率领下从东线西调，及时投入了12月初的莫斯科保卫战，严重挫败了希特勒法西斯攻势的锐气，进而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

尽管那已是陈翰笙离开以后的事情了，但是他们经历过的风险却是相同的。小组暴露后，有34人被捕，尾崎和佐尔格都在1944年11月7日被先后绞死，另有四人不堪折磨死在狱中，陈翰笙由于在1935年返回上海而得以身免则完全是个幸运的偶然。

佐尔格到东京开展工作，会想到邀请并不精通日语的陈翰笙，足见对于他能力品格的信任；佐尔格被捕后，在自白书中，在并非必要的场合以赞赏的语气而故隐其名地提到他，似乎表达了他对这位中国合作者的敬意和怀念。

但是，在上海等待着陈翰笙的是另一个陷阱。他之所以离开日本，据陈翰笙自己回忆，是因为：“1935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负责人）华尔顿约定从上海到东京来看我，可是他逾期未来，我很奇怪，一天我翻阅报纸，突然在《字林西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也就是华文报纸所谓“神秘西人案”的消息，说



约瑟夫·华尔顿因身带三个护照，以间谍嫌疑在中国被捕。我一看不好，没有敢回家，直接从横滨坐船回国了。同船的有《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到上海后，我与他一起去新亚旅馆登记了房间，然后我出去找史沫特莱了解上海的情况。

“敲开房门，史沫特莱一看是我，急忙将我拉进房去，并且不许我出门，怕我被国民党抓去。史沫特莱派人到旅馆去探听一下，果然，我刚走不久，就有国民党的特务前去搜寻”。

两个星期后，陈翰笙夫妇经过史沫特莱安排，在路易·艾黎掩护下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轮船，到苏联去了。但是，这一次脱险并不是陈翰笙的最后一次。

陈翰笙，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还是白色恐怖下一名勇敢、机警、忠诚的出色地下工作者。

注释：

- ①“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所长”应改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副所长”。
- ②1996年10月20日，笔者和陈翰老的外甥女童瑜琼同往西山脚下看望张文秋，问到当年的陈翰笙是否使用化名、使用什么化名。张文秋曾是党中央在上海时期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也当过佐尔格的秘书，据她证实，在上海佐尔格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是陈翰笙，陈翰笙当时果然使用化名，所用化名果然姓王，叫王如卿，伪装的身份是新加坡商人。

参考资料：

陈翰笙著：《四个时代的我》。

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中国的战歌》。

麦金农著、江枫译：《史沫特莱传》。

马德尔著、钟青松译：《佐尔格的一生》。

Charles A willoughby: SHANG HAI CONSPIRACY

Chalmers Jkhnsn: AN INSTANCE OF TREASON

盟军远东总司令部：APPENICES TO A PARTIAL DOCUMENTATION



OF THE SORGE ESPIONAGE CASE

美国国家档案馆：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和美国国务院有关案卷解密材料。



给人以知识和启发

——《陈翰笙文集》中几篇论国际关系的作品简介

张振鷲

在陈翰笙先生百岁华诞前夕，出版了《CHENHAN—SRNG'S WRITINGS 1941—1949》（《陈翰笙文集，1919—1949》），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对这位世纪老人，这是一个极好的纪念；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宝贵的贡献。本书收集了从1919年7月到1949年6月整整30年间作者以英文撰写的大量论文、书评及函札，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多篇是论述国际关系的，有的当年曾在外国刊物上发表，有的是第一次刊布。这些作品距今都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甚至3/4世纪，现在读来仍感到很新鲜，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启发。

排在全书第一篇的是作者在美国波莫那学院的学士学位论文，这可能是标志着作者学术生涯的开始之作。此文成于1919年7月7日，题名《一个好心的外交政策》，主题是评述美国对还不足8周岁的中华民国的外交。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刚刚结束，作者在文章开篇首先指出，长期以来美国总是愿意对中国公平相待，已经给中国人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紧接着写道：“我们怀疑日本人，尊重英国人，喜爱美国人。”短短一句话，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中外关系中三个最主要国家的基本看法，也表现了这位22岁的留美学生某些认识上的年轻特征。具体说到美国



对中华民国的外交，作者肯定那是好心的，但许多事情的做法令人失望，主要是：在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上拖延了时间，在给予中国善后财政援助上犹豫不决，与日本签订蓝辛一石井协定“无视了中国主权”（第9页），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想法错误。论文就这几件事情上美国外交的表现做了评述，最后写道：美国人可以自豪地认为历史使他们有权称为中国最好的朋友，但“在过去几年威尔逊政府期间，很可能还有‘事情的另一面’，难道我们不需要把那一面再改正过来吗”？

第二篇题为《1912—1913年的伦敦大使会议与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创立：一个外交研究》，成文于1921年。这是作者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其内容及篇幅上都看到这无疑是一位24岁的青年学子的一篇力作。文章研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场欧洲国际政治危机（巴尔干危机）中的大国外交斗争。那时巴尔干半岛上的各小国与土耳其间的一场战争使阿尔巴尼亚问题成为国际纠纷，欧洲各大国都想“将战争局部化，延缓亚得里亚问题的解决”（第26页），于是有伦敦大使会议的召开。会议“以创立阿尔巴尼亚国家而避免了”一场欧洲大战，这个国家“不会损害到任何国家，而且仅仅由于它的存在就能把那些可能想互相伤害的国家隔离开”。（第25页）作者分析了英、俄、法、德、奥匈、意诸国相互间以及它们与交战各国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政策，指出：“每一个大国在巴尔干半岛都或多或少有经济利益或战略利益”（第16页），为了自己的利益都真想谋求“暂时的和平”（第26页）；这样，大使会议就促成了结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伦敦和平条约的签订，并暂时地解决了阿尔巴尼亚问题。这种解决也就必然带着有关各大国私利的印记。它们操纵这个新创立的国家的一切，令它确定疆界，为它遴选国王。它们完全不管这个新国家人民的利益，给它确定的疆域只有南北长180英里，东西宽85英里，面积11000平方英里，人口80万，致使“相当大的一部分阿尔巴尼亚领土及其一大部分人口从主体中被分割了出去”（第62



页)。作者把伦敦大使会议称作“庸医”，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巴尔干问题；阿尔巴尼亚国家诞生了，但没有得到自由，而一个没有自由的阿尔巴尼亚“仍然是欧洲的足球，仍然是国际阴谋的一张温床”。（第64页）

以上两篇论文所研究的都是国际外交中刚发生不久的事，既属当代历史，又近似于时论；就其内容来说，既属学术论著，又带有政治批判性。后来的有关国际关系之作，则多为时事评述，主要集中于中日关系上，其中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有几篇我感到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一篇，1937年10月15日写给斐尔德的信，里面主要评述日本政局的一件事：设立“内阁参议”。作者认为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日本政界第一个也是意义最重大的一个事件”。（第543页）参议都由天皇任命，实际上是一个“超级内阁”。作者对10名参议荒木贞夫、宇垣一成、末次信正、安保清种、町田忠治、前田米藏、池田成彬、松冈洋右、乡诚之助、秋田清逐个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样一个“超级内阁”的设置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卓越的政治战略”（第546页），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有所发展的最确实最明确的标志。收信人斐尔德曾著有《美国参加对华国际银行团》一书，关心太平洋国际关系，他读了这封信，回复说：“你关于日本超级内阁的分析实在太好了”。（第547页）

1938年1月，作者发表《中日战争的经济背景》一文，批判日本侵略的辩护士所谓日本对华不是侵略战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不是为任何物质利益、而是“一场心理战争”，指出这完全是日本法西斯外交官所放的烟幕。文章从经济（根源）上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性，这就是：日本由于其岛国本身工业化不充分，缺乏适当的国内市场，急需解决国际资本主义的尖锐竞争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而暴露出自身的矛盾及弱点；这个矛盾就在于：日本资本家要前进，但没有内部发展所需的资本，更缺乏可供输出的大量剩余资本。日本缺乏财政资源用以开发新领土进行殖民及



生产新财富，它只想抢夺并由此垄断原料、榨取千百万更多的小生产者；日本法西斯不能开发日本，便抢夺满州；不能开发满洲，便又要抢夺蒙古及华北。“日本制度的掠夺性是军事冒险或战争的同义语”。（第283—284页）

文章又指出，由于侵占东三省及由此加重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本资产阶级已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是新集团，由军火资本家、与之有联系的银行家、少数与军火工业有利害关系的大地主、以及为军火工业引进原料的大多数进口商组成，可简称为重工业集团；另一个是老集团，由轻工业资本家主要是从事纺织工业的资本家、主要与这些资本家有联系的银行家、大多数地主、以及多数出口商组成，可简称为轻工业集团。（第287页）这两者都想征服中国，前者主要关心的是立即获得原料，后者主要关心的是马上扩大市场；前者主张急切地以军事手段征服大陆，后者主张以缓进的外交及政治方式征服中国。1932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军火工业家及其金融资本家结合到一起成为法西斯集团，在政府中的力量越来越大；日本重工业集团与军国主义者的共同政策就是这场日本侵华战争直接的最主要的原因。（第288—289页）

文章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近来又有新发展（表现于“内阁参议”的设置等等），“这无疑将使日本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不共戴天的死敌”（第291页），中日间的问题已成为全世界的问题。

同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武汉保卫战最紧张的时刻，作者发表《中国持久抗战的前景》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中国抗战问题已成为“当前世界政治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需要考察中日战争的基本性质（第293页）。文章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治上的两个派别激进派与温和派，指出：前者在政治中一直占据优势，直到日军在台儿庄遭到重大失败后，他们开始认识到武力征服大陆远比原来预期的困难得多，于是来谋求与温和派妥协。这种妥协的成果就是6月间近卫内阁的



改组，温和派的宇恒一成与激进派的板垣征四郎一起入阁，这实际上等于是一个新内阁，它体现出了日本自1931年以来最强大最统一的政治力量。两派都想以攻占汉口早日实现胜利。

文章说，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现在正提出中国能否继续抗战的问题，一则日本启示从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弱点举出四条理由说明中国已不能继续抗战。文章逐条批驳了这些理由，指出远东的真正问题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第295页）在中国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主包括所有政治力量的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全民族正在进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从政治、军事、财政、行政等各方面来看，中国继续生存下去的前景都非常好。甚至像板垣征四郎这样的激进派都没有低估当前的形势，认为“战争将长期继续下去”，“日本必须准备至少打十年”。文章说，“战争是否将持续十年，无法预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中国领土上还有日本军队，中国人就只有继续抵抗下去，别无选择。今天中国人正决心为民族主义和民主而战，他们必定会胜利，因为历史上进步力量总是取得最后胜利”。（第302页）

以上是关于抗日战争中若干问题的评述。作者以当时人论当时事，其感受、其见地往往有后人所难及者。战争结束已50多年的今天重读这些作品，每个人都会受到启迪，那场战争历史的研究者则会得到更大的教益。



写在《陈翰笙论文集1919—1949》前的话

李新玉

今天，在这样一个隆重庆祝陈翰笙老先生百岁华诞和《陈翰笙文集1919—1949》（英文版）正式出版发行的活动中，有许多在座的来宾都是老先生的学生，有的跟老先生做研究生，有的跟老先生学英文，不论大家年龄上的差别，职业上的不同，或是职位高低的不等，我们作为老先生的学生，都有着一种共同的认知，那就是：我们真幸运，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上能有这样一位老师，不仅言传知识，而且身教做人的准则。我们也常常看到或听到许多关于老先生的故事，都为他那不平凡的一生而敬佩不已。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知道更多关于老先生的故事，也希望其他更多的人能分享我们的这份幸运。故此，不论我们大家在哪里，我们都有着一种心愿：为老先生做点事。这就是这本《陈翰笙文集1919—1949》的由来。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搜集、阅读、整理、研究和编辑，这本从老先生200多篇英文文稿中精选出来的61篇英文文稿组成的、长达600多页的《陈翰笙文集1919—1949》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它记载了老先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进步而不畏风险高声呐喊的动人故事；它再现了老先生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浩然气质；它闪烁着老先生博学多才的睿智光辉。

陈翰笙老先生的一生是丰富多彩和极不平凡的。1897年2月



5日，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在家乡的一所东林学校读书。十八岁的那一年（1915），在科学救国思想浪潮的感召下，他来到了美国南加州的波莫纳大学攻读植物学。由于视力的缘故，他改学历史，并以优异的成绩在1920年获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并成为美国宪法史教授安德鲁·C·麦克洛林先生的助教。于1921年，他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六国使节会议》。在哈佛大学随人文科学院院士查尔斯·H·哈斯金教授进行了一年的史学论的研究后，他转入德国的柏林大学继续深造，于1924年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应蔡元培校长的邀请，陈翰笙先生成为国立北京大学（今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学者，陈翰笙教授如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将中国建成一个美好社会的事业中。他在北大执教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于1925年介绍他参加革命。为了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陈翰笙教授于1929年率先发起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亲自到长江、黄河和珠江流域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农村阶级关系奠定了基础。1935年，陈翰笙教授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自1936年起，他开始参加“太平洋学会”的工作（英文名为：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一面参与编辑《太平洋事务》和《远东观察》的工作，一面继续进行以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为重点的调查研究。他所主持的关于中国河南、山东和安徽烟草种植区生活水平的调查报告成了“太平洋学会”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比较研究课题。1939年5月，陈翰笙教授来到香港，在宋庆龄女士的指导下，组织“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推动工合运动的发展。同时，他还创办了《远东通讯》英文半月刊。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陈翰笙教授就是用这个刊物最先向世界各地报道了事件的真相。1941年香港沦陷，陈翰笙教授转移到桂林，后流亡印度，直至1946年6月，陈翰笙教授再度应邀回到美国，相



继在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特聘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应周恩来总理之召，陈翰笙教授返回中国，成为外交部的资深顾问，并相继担任了政府和学术界的许多重要职务。

这部《文集》收选的正是在陈翰笙教授从1919年至1949年这30年间用英文写作和出版的一部分重要著作和文章，它是陈翰笙教授这一时间生活和工作的缩影。作为百岁华诞的纪念专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到这位百岁老人理想追求的形成以及为之而不懈奋斗的历程。的确，在这30年中，陈翰老由一个民主主义者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一名战士，积极献身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热情拥护和支持新中国的诞生。所有这些画面都是随着大批文稿的收集、整理和编辑而逐步清晰完善起来的。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在陈翰老各届学生和家人的委托支持下，担任了这本《文集》的主编工作。为寻找到陈翰老早期的文稿和书信，我查询了美国、加拿大、德国、香港和中国的主要档案馆，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OCLC和RLIN图书电子网络。出于当时国际社会的需要，陈翰老经常换用笔名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有：Groffrey Chu Chen, Raymond D. Brooke CH—s, C. H. S., “OBserver”。这给文稿的最初收集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经过反复核查、考证，终于从浩瀚的文库中找到陈翰老发表过的著作和文章达400多篇，其中英文著作的文章达200多篇，少部分为俄文和日文的翻译版。与此同时，我还收集到了陈翰老一大批珍贵的早期书信原稿。这些文稿和书信，单就美国而言，分布在近200所研究机构、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这本《文集》中所选入的61篇文稿仅是陈翰老200多篇英文文稿的一部分，它分为论文、书评和书信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31篇论文，主要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与发展问题和对抗日战争的宣传报道，其中包括陈翰老的学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第二部分是由陈翰老的16篇书评组成。这些书评清晰地再现了他对当时学者和文献资料的



熟悉和他明确表达赞同或反对西方中国问题分析家们论点的尖锐文风。第三部分我收选了陈翰老的20封书信，它们反映了陈翰老与“太平洋学会”这一国际学术组织中的主要研究人员和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文稿都清楚地表明了陈翰老在国际上的学术成就和影响。通过这两年多对这一大批内容丰富、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文稿的收集、阅读和编辑，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对这位享誉中外的老先生的敏锐的才智、严谨的思想体系、系统的治学方法以及他娴熟流畅的英文文笔，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敬意。

在这两年多里，我深深感到陈翰老的故事实在是太丰富、太精彩。我们都知道陈翰老也许是健在的、并经历过20世纪中国四个重大历史阶段（清朝末年、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许多重要事件的最后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然而，这本《文集》告诉我们，陈翰老不仅仅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还是一位始终把自己的理想、工作和生活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紧地联在一起的革命活动家。《文集》所跨越的这30年，正是中华民族从血与火的洗礼中新生的年代，其间充满着进步与反动，侵略与反侵略，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斗争。在每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陈翰老总是不怕艰险，始终站在为真理而斗争的前沿。他利用各种媒体和讲坛，发表文章和演讲，热情宣传中国革命。从这本《文集》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历史的真实记载。

1925年，陈翰老以给波莫纳大学校友公开信的方式，揭露了“五卅惨案”的真相。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起来抗日。身在海外的陈翰老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地连续公开发表文章，介绍抗日战争的背景、状况和进程，帮助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有更明确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号召爱国华侨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



1938年初，陈翰老走遍了加拿大十多个城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和力量，讲述“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周恩来妥善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

1939年5月，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相，争取更多国外友人的支持和援助，陈翰老在香港主编发行《远东通讯》英文半月刊，专门向国外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在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陈翰老以最快的速度首先于1月21日以书信的形式给当时“太平洋学会”的秘书长埃德华·卡特发函，紧接着于1月26日第二次以书信的形式向欧文·拉铁摩发函，讲述“皖南事变”的真相。继后于2月14日，通过《远东通讯》这份英文刊物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控诉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袭击新四军的罪行。

这本《文集》还告诉我们，陈翰老在这30年中淡泊明志，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让世界更多地了解认识中国而默默地工作。他广泛结交各国朋友，向他们并通过他们介绍中国，帮助他们了解中国进而达到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与卡特、拉铁摩、霍兰德、菲尔德、杰非等“太平洋学会”的主要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与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艾黎、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中国问题助理劳林柯瑞先生和美国政界一些主管中国问题的官员的交往，直接影响美国政府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陈翰老的故事还很多很多，这本《文集》仅仅是他丰富而坎坷一生的一个章节。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中国学者，一位毕生热情献身的革命活动家，陈翰老历史沧桑整整一个世纪，为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为推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永远不会忘记1995年10月9日的那一天，当我在陈翰老的书房里请他为《文集》写首页封时，老人家陷入了一种无



限的沉思之中。过了许久，老人家脸上露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定神情，着重地决定将他60多年前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他的“梦”——“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化；而我个人的生活不违反这样工作的志趣”译成英文作为这本《文集》的首页封，并且当即挥笔写下了这句译文：“If my dream reflects my hope that may help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I wish to realize it”。的确，这是陈翰老毕生为之而奋斗的“梦”，甚至已是年过华诞的今天，他还仍在继续为它奋斗。我希望这部《文集》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了解陈翰笙教授为实现人类的文明进步而鞠躬尽瘁的精神。



我所认识的陈翰笙

陈 志 昆

我早在1935年就听到陈翰笙的名字，但是到1938年我才第一次同他见面。我在1934年跟随孙科（我的姐夫），一起回到中国。那时，孙科是立法院院长。我跟他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中国的政局动荡，当时的南京政府还没能统一全国，同一些地方军阀还发生冲突。在江西，内战正在进行。同时，日本进逼东北，窥伺整个华北。战云笼罩全国。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到处在建设，但是，全国的农村在崩溃，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的痛苦加剧。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要求政府抗日，而政府镇压共产党和爱国运动。这些年，我第一次看到白色恐怖。

我看到这些矛盾在发展，感到很震惊。我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国租界和治外法权还存在。而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农村问题。我决心研究这个问题，想找一个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我在南京时，人们就告诉我，可向陈翰笙教授请教。但是，我赶到上海时，他已经离开。一直到1938年，我才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莱大学见到他。

我在南京时已了解到，陈翰笙博士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任理事会主席，也是专门发表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杂志《中国农村》的创始人。他不断地唤起人们认识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1937年底，日本进攻南京的前夕，孙科派我带他的两个儿子到美国伯克莱大学读书。我就在吉亚尼尼农村经济基金会（Giannini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做研究生。我的教授是爱尔斯伯格博士（Dr. Alsberg），他是该基金会的主任。孙科当时劝导我，等战争结束后，回到中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土地改革政策。在伯克莱大学时，我同爱伯格博士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并表示我愿对这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出乎我的意料，爱博士说，我应该请教陈翰笙博士，他不久要来伯克莱大学。爱博士愿把我介绍给陈博士。这样，我们就在伯克莱相识了。

陈博士在伯克莱短暂逗留后，又回到纽约。陈博士在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大学讲学，有时对纽约大学及其他大学的学生讲课。他还在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做研究工作。陈翰笙博士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美国问题专家、作家和新闻评论家。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1950年，我到纽约，时常见到陈博士，并认识了她的夫人顾淑型。在纽约，我们有机会经常讨论中美关系等问题。陈博士夫妇带我去看一部很好的电影《波多金号》。这是俄国海军水手起义参加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后来我们又去看《一个售货员之死》，这剧后来在全世界演出。他介绍我认识许多进步学生。陈夫人同陈博士合作，她学视听教育。后来她回到北京后，在北京推广视听教育。1961年，我们离开北京时，他们送给我们一些古老的画，其中一幅珍贵的画是她家族中的一员画的竹子。他们还送我们一把扇子，上面写有毛泽东的诗词。

日本占领南京、汉口，在中国到处横行。翰笙在美国利用一切机会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我记得在伯克莱大学，有外国学生住宿的国际大厦，各国学生在这里集会讨论中国的战局，许多学生发言谴责日本。翰笙也发言。学生中有德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为德、日侵略辩护，破坏会议。据说他们是日本政府收买的。翰笙发言后，有一个美籍日本助教起立辩驳。但是他每次发言后都



要再三声明：“我是美国公民”。翰笙对日本人进行答辩，他对这个日本收买的特务十分恼怒，所以他尖锐地揭露他：“你为什么要再三强调你是美国公民”？问得那日本助教哑口无言。另一次，一个读博士学位的德国学生，听到许多发言谴责日本侵略罪行后，一面吸着烟斗，眼睛朝上看着屋顶的天花板，傲慢地问道：“中国人到底要什么？”翰笙为他的无礼态度所激怒，生气地回答道：“像你一样，能自由地吸烟斗，而不是像一头牛，闯进瓷器店，横冲乱闯。”听众哄堂大笑，使那法西斯分子尴尬万分，不敢再出声。从这些例子里，我看到陈博士有强烈的原则性和正义感，仗义执言，反对错误言论。

在纽约时，翰笙做许多工作，调查研究美国卷入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一直到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出售军用物质给日本。尽管美国人民是同情中国的，美国商人却卖军用物资，包括废铁、卡车零件、轮胎等给日本。1939年，我要回中国时，翰笙交给我一本书带回中国。这本书揭露战争初期，日本军用物质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来自美国。我把这书给了孙科。

翰笙写的书和文章帮助我了解中国问题。给我最深印象的书是《中国最南部的农村问题》(Agrarian problems of Southernmost China)。那时，我在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农村问题。我发现，陈博士的这本书对中国农村里农民受剥削的事实做出最科学的研究。他把广东农村做典型实例。大约在1934年暑期，他在岭南大学组织学生到广东省的48个县(占全省96县的半数)去调查土地分配和农民受剥削的情况，包括高利贷和不在地主征收数内超额的实物地租，地租高达百分之六十、七十等等。这种剥削的后果是农业生产下降，农民极端贫困。这项调查得到孙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赞助。调查报告写成一本英文书，在国外由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这本书打开我的眼界，使我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本质，我决心继续研究这问题。

日本进攻珍珠港前，翰笙回到香港。他那时担任中国工业合



作协会国际委员会的书记。他争取国际援助和捐款给工业合作协会。工合在中国发展得很快。那时我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的主任。陈博士负责分配捐款和物资。我们得到他的许多帮助。日本占领香港后，陈博士和夫人转到桂林。他继续作研究工作和工合工作。他在香港时，同中国工合的工作人员保持通信，了解实际情况。在桂林时，他深入各地区的合作社，同工作人员和合作社社员谈话，了解第一手的情况。我记得陪同他去现场。有一年我们去广东省的战时首府曲江（韶关），后来又去南雄县烟草和造纸中心。两天后，又去江西赣州工合东南区办事处。他停留了好几天，访问许多合作社。从赣州又去福建南部的长汀。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山城。在访问一个合作社后，来到一个古庙。庙前有一个养鱼塘，社员们在那里集会欢迎他。在战争年代，人们相互之间友情很重。他敦促合作社工作人员继续奋斗，克服困难。他很谦虚，用简单生动的语言跟工人谈话。我记得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两个老鼠，偷牛奶吃，掉进奶缸，爬不出来。他们怕淹死，就拼命地在缸里来回游。它们游得很累，一个不游了，沉到缸底淹死，另外一个坚持游，一直到牛奶冻结，它爬出来，没有死。陈博士用这比喻叫大家克服困难，坚持下去。

陈翰笙的政治敏感性很强。赣州是国民党的反共中心。那里有好几个特务组织。他们敌视工合。陈翰笙是被特务注意的一个。翰笙到这里和在福建都感到不放心。他到了长汀本来打算去永安看看。但是，他在长汀过了两夜，就立即回赣州，返回桂林。有一次，他到郑州考察，在火车车厢里，一个国民党的官员来拜访他，留下一张名片。一回儿，国民党的宪兵来车厢查问他的证明。他顺手就把那国民党官员的名片给宪兵看，宪兵立刻就退出去了。

陈博士干什么都要弄清事实。他跟合作社工作人员保持通信关系。在国外时，他同国内保持联系，了解情况。他写文章和讲话，都是简单明了。另一点是，陈博士孜孜不倦，不断地学习、工作，他很热心地帮助别人。他的视力不好后，还教年轻人学英语。



他总是想做点有益的事。多年来，我们每次到北京，都去拜访他。他热情友好如旧。准备蒸鸭、鸡汤招待我们。我们讨论各种问题，使我们的拜访有兴趣，有收获。1996年，我们去拜访他，听说他不久要庆祝百岁大寿，我妻寿珍对他说，“你一定要发请帖给我们呀！”他马上回答说，我现在就正式请你们。很遗憾，他两次做寿，一次是科学院组织的寿庆，一次是家庭寿宴，请帖都寄得太晚。我们收到请帖时，来不及赶到北京参加。最近一次我们见到是在1998年6月10日，他已经101岁。他没多讲话，但是他听我们讲。我们问他，“知道我们是谁吗？”他说他知道。他叫出我们的名字。他不断说，我闲得慌，我要工作，请你帮我找学生。翰笙是一个老师，启发别人。我第一天在伯克莱见到他时，他就是这样。认识的人都钦佩他，他精力胜人，总想做些有益的事。他原则性强，矢志不渝，勇于捍卫真理。他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自己的国家，给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进步。

翰笙夫人早逝。失去他生活中的伴侣，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但是他不动摇，自始至终，忠于自己的事业，为中国，为全社会而工作。



附录一

庆祝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 陈翰笙同志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

(1985年9月28日)





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严谨的社会科学家

胡 绳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陈翰笙举办茶话会，祝贺他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在这里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陈翰笙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由衷的敬意。

陈翰笙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早在1924年回国后，他已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决心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1925年他成为共产党员。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重重苦难的时代，陈翰笙同志长期在白色恐怖的惊涛骇浪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进行学术研究。他既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一个严谨的社会科学家，他的社会活动和学术工作都是按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而进行的。

30年代初还是中国革命的苦难时期，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冲突达到非常激烈程度，与这政治形势相联系的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也就是关于革命性质的大论战。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陈翰笙同志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经济基础，特别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他深深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农民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对农村的科学调查研究工作。1933年创办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团结和培育了一批研究工作者，当年参加研究会的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我



党的理论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骨干，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同时，陈翰笙同志也对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状况以及对国民党内外政治派系问题进行研究，还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在三四十年代，陈翰笙同志不但在国内进行大量研究工作，而且在苏联、日本、美国、印度从事研究和写作，同时从事了大量的国际活动，特别是先后两次在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6年至1939年，陈翰笙同志应太平洋学会的聘请在纽约编辑《太平洋事务》，这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陈翰笙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论述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性和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的前途。

1946年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陈翰笙同志在印度接到周恩来同志和廖承志同志的指示，前往美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在美国一直工作到1949年。在这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四年中，为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真相，写下了许多有力的论文。他以充分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中国最最腐朽的势力，中国的内战是人民民主力量对抗封建、买办势力的斗争。由于他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过深入的研究，并且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美国的情况有渊博的知识和充分的了解，所以他两次在美国写下的学术性的政论文章，具有说服力，对美国的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陈翰笙同志参与国家的外交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外事活动，同时注意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发展史等方面的问题，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期，他虽然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即使在那样的形势下，他不顾年迈体弱，还邀集一批又一批有志于要学习的青年学英文，许多青年人不但学到了英语，而且学到了为人、治学的道理。从这里可以看到陈翰笙同志一向关心培育青年、哺育后进的值得尊敬的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非常兴奋，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他虽然视力减退，但还由助手帮忙收集资料从事写作，像青年一样朝气蓬勃，追求真理。他十分关心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总是向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和给予有益的指导。从陈翰笙同志28岁起致力于革命和从事学术活动已经60年了，从他60年的奋斗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踏上革命的道路，在党的培育下坚持革命、献身社会科学事业。由于陈翰笙同志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所以在学术上刻苦钻研，踏踏实实地下功夫，力求在掌握丰富知识的基础上对研究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正因为他的著作有严谨的科学性，所以才有效地服务于革命事业。

陈翰笙同志虽然年事已高，身居二线，但精神上依然战斗在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第一线上，这是十分可贵的。在学风上陈翰笙同志从来是鄙弃华而不实言之无物的空谈，他认真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身作则，坚持这样做，这就是陈翰笙同志60年学术活动值得我们尊重的缘故，这就是我们应该向陈翰老学习的地方。请允许我向陈翰老表示：祝你身健康，希望你继续给我们指导和帮助。我们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广大理论工作者，一定以陈翰笙同志为榜样，坚持马列主义理论阵地，努力为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拿出高质量的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翰笙与中国农村调查

薛 暮 桥

我是陈翰老的学生，我和孙冶方、钱俊瑞、张锡昌、秦柳方、陈洪进很多同志都在陈翰老的指引下研究农村经济问题，走上革命道路的。陈翰老1924年回国，由蔡元培先生聘请在北大当教授，认识了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器重陈翰老的才华，介绍陈翰老为共产国际的刊物撰写政治评论。他写了许多文章，因此在国外很有名。

1925年冬天，蔡和森同志从苏联回国，经过北京，和陈翰老谈了一个通宵，谈了澎湃同志在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运动，使陈翰老认识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立志作农民问题研究。在李大钊同志被捕后，陈翰老待不住了，到苏联去了，在苏联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当时他们苏联人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但却空谈理论。陈翰老认为研究农民问题不能光靠经典著作，要做农村调查。因此在1928年回国后，应蔡元培先生邀请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中部到河北的保定、江苏无锡。1933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受到国民党的干预，已待不住了，1934年他辞职去中山文化馆工作，搞广东农村调查研究。调查报告是他亲自执笔，用英文、中文发表，在美、苏、日、英的影响很大。陈翰老的学术活动，是与党的政治运动分不开的，



他的调查结论是，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国民党当时向苏区发动了几次大围剿，正在这时候，陈翰老用英文发表了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用太平洋学会的名义在国外发表。他还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会议，与各国专家交换经验，宣传中国土地问题，实际上是抨击国民党的围剿。这次活动在美国等国产生很大影响，使美国许多进步学者认识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是不对的。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是不容易的，宣传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也是困难的，但是他同买办的作者，改良主义的学者斗争，用不同的方法，特别是与托派的观点（托派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已完成，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进行民主革命）相斗争。陈翰老用了大量资料证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毛主席也是很重视农村调查的，但调查范围局限于中央苏区，范围小，只在苏区发表。陈翰老的调查从华北、华中、华南收集广泛资料，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表，用大量事实说明党的革命路线的正确，当时起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其中包括我。我1932年初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农村调查，虽然半年后离开了，但我以后一直从事农村调查，后来又由陈翰老介绍到广西师范学院做“农村经济”教员，陈翰老给我的任务是要我利用这机会做农村调查，并在广西发表了调查报告。陈翰老在广东调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报告在许多国家发表，当时在苏联刊登过编者评论：作者虽然不是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他知道陈翰老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陈翰老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受到排挤，1933年他看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办不下去，他就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1933年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他1934年和王寅生、孙冶方到广东，进行更为详细的农村调查。我从广西回到广东也参加研究工作，后来我们回到上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吴觉老是该会副主席，陈翰老是理事会主席。



《中国农村》刊物的出版是很困难的，创刊时请蔡元培题写刊名，通过王昆仑、孙晓村的关系登记，开始国民党以为是农学会刊物。1935年在上海的共产国际组织被破坏，陈翰老出逃外国，在国外和我们继续联系，利用我们的调查资料，他在国外宣传，发表了很多文章，在美国影响很大。

1951年陈翰老回到国内，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大家都很忙，当时的骨干份子都担任了很重要的工作，农村经济研究会自动结束。

陈翰老培养的许多同志在经济工作战线上做了很大贡献。陈翰老在国外的名气比国内大，所以回国以后搞人民外交，担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多次出国访问，在人民外交方面作了很大贡献。同时陈翰老对中青年一代培养教育，培养了许多研究生，直到现在还在帮助青年人。

陈翰老同许多外国专家、朋友保持联系，爱德乐先生、爱泼斯坦先生、马海德先生、路易·艾黎先生都是他的老朋友。在抗战期间陈翰老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和艾黎一起搞工业合作社，对解放区的工业建设做了很大贡献，“工合”又培养了许多干部。解放后，农村经济研究会停办了，“工合”也停办了，“工合”的干部现在已在全国经济战线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作更大的贡献。

陈翰老快90岁了，我祝陈翰老健康长寿，同时感谢今天参加会议的国际朋友。



求真求是 刚正不阿

——祝贺我所敬重的翰笙同志

吴觉农

今天我们能有机会在这里为翰老庆祝他从事研究工作 60 周年，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同翰老相交已经半个多世纪。我们是同年，而我一直很尊敬他，把他当做我的良师益友。我敬重翰老，并非将他看作一个“完人”，但我认为翰老的品德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非常值得钦佩，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一是心向革命，坚定不移。1931 年，通过一位老党员的介绍，我认识了翰老，见面之后，谈得很投机。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中国到了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翰老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痛恨国民党反动的反共政策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主义，但翰老并不悲观失望，他认为中国民族已经觉醒，中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不久，翰老邀我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翰老为“农经会”的生存和活动费了不少心血，他的劳绩是很有价值的。在“农经会”进步同志的影响下，我在思想上得到不少帮助。1935 年我借考察茶叶的名义顺道去苏联访问，目的是看看社会主义的苏联，此行可以说是同翰老的影响分不开的。抗战期间，我同翰老夫妇在日本、桂林等地多次相会，不论在什么恶劣的军事政治环境下，翰老对



民族的前途都充满了信心。抗战胜利后，翰老在美国，他对国内的形势还是十分关心，张锡昌同志被捕后，翰老立即来电营救和关心事态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翰老夫妇迫不及待冲破重重障碍回到北京。他心情振奋溢于言表，因为他认为他所期待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第二是刚正不阿，不图名利。我觉得翰老身上突出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讲气节重操守的优良传统。在敌人面前，翰老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一付不畏强暴的铮铮铁骨。翰老早年就是一名扬中外的学者，但在国民党政权下，他绝不同达官贵人和御用学者为伍，也绝不向他们低头。十年动乱期间，翰老受尽折磨，但他不向“四人帮”和极左势力屈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同志和朋友之间，翰老服膺真理，习惯独立思考，不随便附和自己没有想通的问题，但一旦事实或说理能使他信服，他又能“从善如流。”翰老不计较个人名位，不顾忌个人的功利得失，本人的生活很俭朴，保持着“一介书生”的本色。翰老待人真诚，特别是同情受难者。文革期间，“四人帮”剥夺了他搞研究的权利，他就把精力放到培育青年人身上，他所教的学生中有的所谓“黑帮”子女。有人劝他“少找麻烦”，他回答说：“青年人无罪，我们的未来需要他们。”今天的事实证明了翰老的高瞻远瞩。

第三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翰老一生勤奋，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他从不作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每研究一个问题，必定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认真进行分析。我仅举这样一个例子：翰老早在1924年就写过一篇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的文章，全文仅三千多字，引证的资料书刊多达50多种（仅参考的就有50多种，阅读过的最少应有百种以上），因此文章立论有根据，内容充实，真是掷地有声。我读后不禁为之折服。当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同志们做了不少扎实的农村调查，我认为这是受到翰老求真求实精神影响和直接指挥而完成的。可惜



有不少材料散失了。

以上我只是粗略谈谈我的几点感受，挂一漏万，当然不能概括翰老的全貌，谨以此向翰老表示我的一点敬意和祝贺。愿翰老在珍重身体的情况下，为“四化”贡献出更多的精辟的指示和著作。并祝翰老健康长寿！



培育后进 诲人不倦

孙晓村

今天，能参加陈翰老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的庆祝会，我感到十分高兴！关于陈翰老在学术方面的光辉贡献，刚才同志们已经讲过了，我完全赞同，并对陈翰老表示由衷的敬意！

现在，我只谈翰老许多美德中的一项美德，那就是培育后进，诲人不倦。我从我的亲身感受谈起：1930年下半年，我和陈洪进同志在安徽省天长县县立中学教书，每逢假日，我总去农村看看，那时的农村，真是一片荒凉景象，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整个农村没有引人注意的色彩，惟一醒目的东西，是美孚油和日本什么眼药的广告，我看后，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翌年，我回杭州教书，开始研究农村经济问题。我看了一些书，想知道怎样才能挽救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不料一看之后，反而越看越糊涂，有的说办合作社可以救济农村；有的说必须先办教育，让农民有文化，有知识；有的说要学习美国办农场的那套办法。我还看到一本讲法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书，才知道法国农村中小农经济占的比重不小，那么为什么法国小农经营生产情况很好，而中国的小农经济那么贫困落后呢？许多问题想不通。有一次，读到翰老的文章，觉得很好，马上去信请教。不久，翰老来杭州，我们有几次长谈，他教导我，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应从调查入手，了解农村中土地分配的情况；他教导我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应用到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上来；他教导我，中国农村中封建土地制度存在一天，农村经济问题就无法解决，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等。几次谈话，使人茅塞顿开，豁然贯通，从此我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就有了正确的方向、方法。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深深感到，翰老是我的引路人，是我的老师。后来，由于翰老的介绍，我参加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负责组织浙江、江苏、河南、陕西四省的农村调查，使人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翰老这种教育后进、诲人不倦的精神，不因高年而有所减退，50年代末，友人汪熙同志写了一本关于印度的著作，他久仰翰老对印度很有研究，托我介绍认识翰老，请翰老校阅这部稿子，那时翰老的目光已不大好，但仍认真作了校订。从此以后，汪熙同志和他的夫人董幼娴同志以师事翰老伉俪，过从甚密。今天庆祝会上大家得到的那本翰老文集就是汪熙同志编的。汪熙同志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工作很忙，这本文集，是他主动挤时间为翰老编的。尤其使人感动的是近几年来，翰老目力甚差，很少外出参加会议和处理工作，但他仍奋力为朋友的子女和一些参加外事工作的干部补习英语，每天上下午，有时加上夜间，分别不同程度开班，列为高级班的学员进门之后即必须用英语交谈。翰老英语造诣很深，许多同志在翰老的教导下，英语程度进步很快，成为外事的骨干。翰老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倾注在培育后进的上面，这种高风亮节，使人无限敬仰。最后，我借用翰老文集编者在“前言”中的两句话以表达我对翰老的崇敬：“陈翰笙同志在学术上是一代宗师，在品德上是一代师表。”



陈翰笙与国际宣传工作

爱泼斯坦

我不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因为各位已经说了不少的话了。我只想讲我认识陈翰笙同志50年了,而且我要讲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不会在中国,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现在工作的《中国建设》这个刊物可能根本不存在。正是通过陈翰笙同志而且得到宋庆龄同志、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中国建设》得以创建,我和已故的夫人邱茉莉一起参加了这个工作。

我想补充一点有关解放前后,他在中国革命对外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他除了自己进行写作以外,为了使中国革命被更多的人了解;外人所知道的撰稿人史沫特莱、斯诺和斯特朗都是通过和陈翰笙同志的接触交换意见有所收益,他帮助他们获得基本的了解。在国际统战工作方面,我已故的妻子邱茉莉参加太平洋学会时是一个年青的英国女人,在与陈翰笙同志20年的工作接触中她获取了很多益处,通过这个关系,我认识了我的妻子。

有人谈过了,我还想重复一下,陈翰笙同志的学术智力方面的活动,总是和他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同时我还想谈一下,陈翰笙同志的妻子顾淑型也是《中国建设》的创始人,又是陈翰笙的很好的贤内助和一位很好的同志。我想今天在座的不是我一个,而且有许多人,如果不是陈翰笙的影响,不可能在这个会上坐在一起。



我所了解的陈翰笙

爱 德 乐

主席同志、陈翰笙同志、同志们、朋友们：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代表路易·艾黎讲话，他现在正在生病，住院了。我们大家都预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60年前的今天，陈翰笙教授，开始在北大教书，因此我们今天是在庆祝中国最杰出的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卓有成绩的有高度创造性的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60周年。

陈翰笙同志是一个活跃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的活动遍及三大洲（欧洲、亚洲、美洲）和六个国家（中国、印度、日本、苏联、德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所有这些大洲和他所活动的国家中，他从未停止将革命活动和智力活动结合起来，从未停止将热切的爱国主义和典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学术上进行创新以及同时坚持做一个坚定的、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在这些年代里他曾毫不懈怠地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奋斗，从职业生涯一开始，他不论面前有多少阻力，始终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而努力。当然我也不必多说，他现在还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我们祝愿他在福寿年长的年代里继续为我们作出光辉的表率。

陈翰笙博士出版了许多卓有见识的殖民地半殖民国家农业关



系的著作。我最初看的他的两部著作是《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这两部都是经典著作，而且具有权威性，当然还有广为人知的启迪，以及组织了非常有权威的调查，著有《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这部著作是在30年代出版的。后来他的这部著作由纽约的“太平洋学会”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在政治上和科学上都是重要的事迹，因为它否定了J·L·巴克的《中国的土地使用问题》所提出的对中国农业关系的正统的资产阶级的分析。

我第一次在香港见到陈翰笙同志，是已去世的我亲爱的朋友冀朝鼎同志介绍的，我们美国人、中国人也是同样认为，很幸运中国有这样两位杰出的革命家参加我们之间的活动，时间是在30—40年代。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他是那么风趣幽默，告诉国民党实行的实物土地税。在1941年以前，他的活动是从他的朋友处得知的。当时我已知道在朋友和学生中陈翰笙同志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北京他认识了李大钊，在上海认识了鲁迅，是宋庆龄的一位忠实同事，不仅如此，他在日本、印度、苏联和美国，有数不清的朋友们。

在香港，我在《远东通讯》上看到他十分权威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况。当时他是《远东通讯》的主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在香港又是“工合”主要组织者活动者。

我后来一次见到他，是1944年初在桂林，他刚从日本占领的香港化装成一个商人逃出来。后来又听说他去印度了。正好1944年逃避了蒋介石的逮捕，正像是1935年由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帮助他逃离上海一样。

在印度逗留期间，他勤奋学习，研究印度的土地关系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当时发表了。15年后我从坦尼·弗那里知道在印度收集有关南亚印度区域很多经济材料，尽管在20年前已经完稿，但是直到1980年孟买才出版。

过了六年在英国剑桥我们又见面了，当时中国刚解放，他正



准备回国，我陪他参观剑桥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牛顿居住的房间，这时他用他特有的直率方式说，牛顿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是确实的，牛顿不仅是一位英国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曾积极支持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1689年国会的成员，还是一个秘密的宗教离经叛道者。陈翰笙同志回国后，参加成立出版《中国建设》月刊的活动。

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是1957年，而且有幸和陈翰笙同志共事，经常碰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开始，他失踪了，对于一位这么坦率陈述发表意见，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文革期间失踪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在1973年或1974年初又碰到他，以后我们经常互访，即使在1976年的4月一直到四人帮倒台的半年，这最艰难的时期，他毫不畏惧给我们住的和平宾馆打电话，我和我的妻子由于他的勇气和对我们的善意深深感动。

作为一个学者、教师和有创见的思想家，陈翰笙才气横溢，博大精深，思想清晰，具有说服力。

作为一个活动家，他勇敢、多才、多艺、审慎，而且坚定不移而灵活。

作为一个人来讲，他热情、坦率和勇敢，有人说他简直达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他不允许虚伪，而且不能甘心情愿容忍蠢才。同时他非常耐心地愿意将他的时间给每一个学生，不管初学的还是学识比较高深的人，只要这些学生是诚心诚意想学习的，均给予他们以自己的时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他无私地将自己贡献给他的工作和他的学生。

陈翰笙很幸运，他有一位贤内助，她在非常惨痛的很困难的1968年去世了。我们幸运陈翰笙有一个忠于他的家庭，我们大家都幸运有他作为我们的教师、同志和朋友。我们共同祝愿你今后仍有许许多多的创造性的活动。你已经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深信今后你将作出更多的贡献。



庆祝陈翰笙教授
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70周年

(1994年10月11日)



翰老跨世纪的一生

薛葆鼎

我很高兴能参加陈翰笙老教授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70周年庆祝会和“翰档”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仪式。70年前，28岁的陈翰笙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法律系担任教授，当时是蔡元培亲自邀请的最年轻的教授，不久便按李大钊安排为共产国际“国际通讯”撰稿。这是以学者身份开始了国际的政治活动，现在陈翰老已经98岁高龄，视神经萎缩而能亲自出席70年后的这次庆祝会和这个“翰档”交接仪式，这两件事都是国内少有的。

我知道翰老的大名开始于30年代翰老在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做中国农村调查，我认识翰老开始于40年代翰老从美国西岸向东旅行路过美国匹次堡动员我为上海《文汇报》写“美国特约通讯”，为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纸提供中美间的国际知识资料，可是我比这位无锡同乡老前辈小了20多岁，我观察他老人家50多年了，真像孔夫子论语上说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他这位传奇中的老人仿佛是一个有棱有角的多面体，至少有十一二面，从哪个角度来看也总认识不全，而且几十年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的形象从机智敏捷、才华横溢到年老体衰仍然“志在千里”，也已经变化了好几个轮廓，怎样才能认识得比较全呢？恰巧：

80年代中，陈洪进先生一年四季每星期一早晨到翰老书斋里



叙谈一两个小时，我后来也参加了。那时翰老已近90高龄，视神经开始萎缩，而满腔热情、忧国忧民，每次谈话总不忘国内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偶尔联系着一点他个人的经历与经验。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就翰老写的“地下工作的25年（Twenty-five Years Underground）”，要我谈谈我的读后感，我重点讲了不为国内许多人所知道的翰老40年代在印度和在美國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陈洪进先生就约我参与他正在建立的“翰档”工作。

我赞成建立“翰档”，也因为便于对翰老有个历史的认识，那时洪进先生已近80岁，我自己也已近70岁，要建立“翰档”传下去，为时已不算早了。现在洪进先生体弱多病，很久不去翰老家；我右膝有毛病走路不便，也很久不去了。可喜的是由李大钊做过早期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愿意接收与接办“翰档”，这事有个好单位接着办下去了。

对于翰老这一位除了中文之外，兼通英文、德文、法文、日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还学过印地文和乌尔都文（巴基斯坦通用）的语言学者，多年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和工业合作）、教育、外交、新闻、出版等学科作学术活动的社会科学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终于能以档案形式把他的生平著作与生平事迹有关的实物系统收集起来以便研究，实在是大好事。

可是现有的“翰档”还只是手头能集中到的资料，以我所知，离开“全”还差，因此还得发展。

比如说，20年代翰老为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撰稿是李大钊安排的，翰老写的内容和在翰老之前李大钊或别的人写了没有，应该查早期“国际新闻通讯”在积累起来研究当年他们对北洋政府时代观察的深度。再比如说，30年代早期，翰老在上海帮助史沫特莱为德国法兰克福论坛报写文章不止一两年，应该查那时法兰克福论坛报，研究两人地下工作观察国民党统治的深度，而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是翰老在国民党上层活动的结果，在共产国际



和法兰克福两方面的资料只能希望往后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得到弥补，至于翰老与前苏联追赠为“苏联英雄”的佐尔格（George）（曾向斯大林传送日本将向太平洋发动战争的情报，便于苏军在远东撤向欧苏方面，以加强抵抗力量的地下革命者）同在日本的活动，恐怕已难找到资料了。

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利用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关系，翰老组织了多次规模很可观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对此国内外都很推崇，因此所得成果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澄清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特别是强调了土地革命的任务，西方文化界有识之士认为这几次农村调查是在国民党森严统治之下所独立进行的，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进行的社会调查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引到了非搞土地革命不可的结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冯和法为此在80年代编出了三大厚本《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可能还有遗漏。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档案室内就有当年的零星稿件未能编入。而西方文化界很少了解的是翰老在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中培养出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经济学者，往后几十年，他们很多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的权威学者，其中最出名的，如薛暮桥、张锡昌、钱俊瑞是自学成材的，而与那次农村经济调查都分不开。如孙治方，是留苏回国的，也从那次农村经济调查收益不少。追本溯源，“翰档”正可以用事实来说明这段历史。

40年代翰老在印度冒热带的大暑天钻在驻印度的英军 bangallow 卷棚式矮小兵营内，从“英国皇家调查团”14大本证词中摘记资料，翰老夫人顾淑型几次告诉我说：“他浑身生满了痱子还笔不停地写，为了考察东亚次大陆能深入民间访问，（他们）两人还自学印地文和乌尔都文”，“顺便研究”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后翰老在美国西岸华盛顿州立大学写成了中文译名《印巴经济地理》一书，便是他参考东亚次大陆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而加以系统化理论的创作，其中归纳5条经济区域分类标准，从农业生产力到土地关系，到80年代印度学术界还在再版引用，翰老这



本书有文有图，与1936年冀朝鼎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都有特殊的学术成就（冀朝鼎原稿有中译本），冀朝鼎研究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翰老研究的是印巴殖民地社会，他们间没有交流学术思想的了解，阐明的都是经济地理方面的区域划分问题，值得对照着研究。

1948年1月16日翰老在美国纽约留学科技人员组织的“建社”成立会上即席发言，讲了“中国工业化的途径”。当时我笔记了要点，为翰老用舒松作笔名，登载在《建社通讯》第一期上，事过36年，一位“建社”社员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抄走的文件给了我，当年登载记要的《建社通讯》第一期居然出现在我眼前，这已是海内孤本，我加以整理补充，洪进先生看了认为其中含着“闪闪发光”的因素，难能可贵，讨去纳入“翰档”。

翰老那次发言正是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度，距淮海战役还有10个月，人民战争大局已胜利在望，而留美进步科技人员中关心的已是建国问题与回国效力的问题。可是对资金从何而来，群众认识当然不一致，翰老的发言简洁明快，提出了“国内市场积累资金论”，强调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市场交换来积累资金，一不能搞资本主义残酷掠夺的“资本原始积累”；二不能靠帝国主义搞马歇尔计划似的恩赐与往往受制于人的外援；三不能靠出卖领土与主权、丧失国格以至回到殖民地地位上去。他这些话，给当场听众如同一服清醒剂。他还指出了新中国该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还指出了建设程序上大致该按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走，这条工业化道路和建设顺序，解放后经过了14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已由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正式提了出来，可见翰老对那时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不合适于新中国已有明确批判性看法，至于说借外债则是国家内部“政治清明、官僚根绝（指新政权）”，外部有友好有利的条件才允许举债，也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这是比实践早了10多年的理论预见。为此，我在1984年和1994年两次把《建社通讯》上的不全的纪要加以补充



校改后存入“翰档”，借此表明翰老作为历史学家而致力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且明确是为了开创光明的未来而从事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也就是于此中取得政治、经济方面的成就，这正是翰老经常提倡的学历史这门学科的目的，而他自己早已在身体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翰老从印度再次到美国，他的活动十分活跃，我当年只知道翰老在许多大学和学术团体内作了有深刻影响的公开演讲，其内容主要是宣传土地革命和与土地革命直接关联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只知道翰老是在以“星王座谈会”为代号的“中央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是有周恩来、廖承志亲笔联署去信委托的。今年夏天经过美国朋友麦金农(Mckinnon)的查证来信，才知道1945—1949年许多美国朋友早已认为翰老实质上已是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官方大使”。

翰老的政治活动，早在1939年在香港即为宋庆龄做对外联络工作，那时他主办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就募捐巨款经廖承志直接送延安支援革命根据地由李富春签收；第二次到美国后，翰老又经过美共主席Foster的秘书Games Allen在中共与美共之间作联络工作。据麦金农在“陈翰笙教授的国际贡献 (prof Chen Hanseng's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s As I Know Them)”一文中说：翰老40年代早期就通过多种渠道的文字特别在个人交往中密切影响到罗斯福总统的驻华特使拉林·柯里(Laughlin Currie)，经过柯里向罗斯福的报告而影响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这使我联想到冀朝鼎的地下工作。冀朝鼎在国民党孔祥熙系统内掌握了“国际货币平衡基金委员会”的实权，能做到代表国民党政府全程陪同40年代中访华的华莱士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返美后直率斥责蒋介石政权法西斯独裁，事实上，有了几年前翰老通过拉林·柯里对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影响打了基础，冀朝鼎对华莱士的工作效果便相得益彰，至于翰老40年代在纽约就近提供3S(Smedley, Strong, Snow)等对中国问题写作素材之丰富，更为美国朋友所



称道，这在国内还没有多少人知道。

40年代后期，翰老重到美国之后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著名大学，如：哈佛、普林斯敦、耶鲁、哥伦比亚、琼斯·霍布金斯等等到处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为此几次横越北美大陆，在听众中引起了广泛影响。他的好处是英语流利，即席演讲生动有力，非常能说服人。现在看，可惜的是当场都没有底稿与记录。70至80年代，我几次重访美国，在美国人文科学界听到对翰老的评价，特别是号称“美国的中国通”的费尔班克(Fairbank)教授说：“美国之所以丢失掉中国，主要是听信了陈翰笙教授的话”。我回国后就此种说法请教翰老，他却说：“这些可能都是瞎猜的。”我倒想：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活动的独特贡献，正在于有形无形之间，比如说：我国几年前已组织了3S研究会，从3S叙述解放前国共两党的分歧中也可以看到翰老的部分作用，这是有心人可能钻研得出的奥秘，从麦金农文章中所说翰老对拉林·柯里的直接影响，再者拉林·柯里向罗斯福作报告的作用，早晚会把其中奥秘解释开的，现在先“备此一说”好了。

全国解放初期，翰老向周恩来辞谢了不当外交部副部长；向陆定一辞谢了不当北京大学副校长；向宋庆龄说明了不当英文《中国建设》杂志的总编辑，推荐更有编辑具体经验的金仲华来当，自愿当副总编辑，并且只在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当副所长和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参加点儿外事活动，他自己一再谦让而选择了自己乐于担任的研究工作岗位，正是古人所说的“淡泊以明志”的风格。

“文革”后，翰老在东华门住家，顶着“四人帮”打击高干子弟的压力，毅然在家中为所谓“黑帮子女”义务讲授英语；到了木樨地新居，不顾双目近乎失明，每星期两、三个晚上用自己设计的生动活泼造句练习方式继续义务教英语，为了英语中的时代变化，他亲自选编了《英美时文选编》作教材，这两个阶段的教



学完全体现了翰老的书生本色与凛然正气，提倡教育为后代服务，以后又亲自担任世界历史、农村经济等四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总想不厌其烦地做到“又顾又问”。90好几岁了，还出任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想着还大有作为。可惜限于视力，所写文章已越来越少，然而还不时口述短文发表在“群言”杂志上为加强教育战线呼吁，就是这样，十几年前他主编的三百多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出版了，翰老真是70年来不知疲倦的人。

我希望这次庆祝翰老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70周年会后，能看到各位会上发言的汇编，以便过细一点观摩，从各个角度观察翰老跨世纪的一生。也有人对我说：“陈翰笙的所作所为的许多大事，有如旧社会中的江洋大盗。”听我介绍了他为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写文章开始的革命生涯，看了翰老自传《四个时代的我》之后，又觉得他“不过是一个白面书生”，意外吧？其实反过来证明翰老本人是有棱有角的多面体，少说也有十一二面，确实不易为人了解。他这70年，是他把在国内不同处境和在国外四次流亡环境中不断做学问和在多学科中进行的革命实践，说得到做得到统一起来的生涯。“翰档”的可贵价值正因为历史地反映了他这个20世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其中“闪闪发光”的内容大大的有。

祝“翰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更进一步充实与发展，以有利于对翰老这一生和事业的研究。



翰老至少立过三个大功

陈洪进

北大图书馆的文库都是我国著名学者的丰功伟绩。人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某位学生的生平。譬如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说范文澜是新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家；说冯友兰是当代的新儒家。可是，一两句话却概括不了翰老。他既是社会活动革命家，政论家，又是学者，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如今，世界上有许多饱学之士，专门研究中国文化，有些学者对翰老很有了解，日本有人专门研究翰老。如果我们对翰老，一无所知，就难免不是我们的一件憾事。所以，我趁此机会，对翰老的功绩，讲几句话。我觉得，翰老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人民是立了功的。他一生，少说些，至少立过三个大功，一是反“围剿”，二是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三是为党在国外进行调研。立功、立德、立言三者，他兼而有之。

先讲反“围剿”，所谓“围剿”是指我国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进行残酷的血腥镇压，俗称三光（杀光壮丁、抢光粮食，烧光房屋）政策，西方称之为“大屠杀”。翰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反对土地集中，主张土地重新分配，从根本上反对“围剿”。我国反动派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在准备进行更大规模“围剿”的时候，翰老用最短的时间，运用他所掌握的资料，写了一



篇题为：“现代中国土地问题”文章，面对世界学术界谴责中国反动派的镇压政策，坚决支持土地革命的主张。从此，翰老本人成为我国土地问题的权威，土地革命论为我国学术界的许多人所接受。这是翰老的第一大功。

翰老的第二大功是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农研会成立之前，中国农村研究是在“中央研究院”围墙里面做事的，“农研会”成立后，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也开始研究中国农村。这也叫做中国农村研究走出象牙之塔。在1933年前后，在“农研会”成立不久的時候，我在“农研会”内部做编辑工作，总是小看这个团体，认为这不过是学术团体。建国以后，到了60年代，正在“四清”时候，我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所长对我说：他过去经常阅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的《中国农村》，思想上受了影响，所以才去延安。听了他的话，我才认清了“农研会”的革命意义。才令我想起马克思曾经强调过的人的因素，认识到：如果没有大量渴望土地革命的青年干部，要想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怕也是很困难的，教育青年认识农村问题，这是翰老的第二大功。

翰老的第三大功是在美国进行调研。早在本世纪20年代翰老在北京研究《资本论》时，对马克思主义论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带来民主制的论点坚信不疑。到了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询问他，美国一向以民主治国自居，为何偏与我国独夫民贼如胶似漆。翰老在美国立即实行调研，以当时实际情况作答：告以我国的四大家族用我国的民脂民膏在市场上换取最吃香的克雷斯勒汽车公司股票，收买亲蒋议员的选票，因此，独裁风气来自我国，这是翰老的第三大功。

按我国传统，人生的三件大事是：立功、立德、立言。所谓立德，也就是指所立的功，超越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范围。我国有句古语，叫做“大德不赏”，就是说，功劳过大，不是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某个国家能用物质酬报的。例如：种



牛痘，避免出天花，谁也没有想付多少钱给发明人；古代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近代的中药物针灸，都是造福人类，而人类无法报酬的。

翰老经常对人说：“幸亏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教我做人的道理，如果没有母教，我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人呢。”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一个人能力大小是小事，做人是大事。二层是：做人的教育要小时候讲，这是翰老的立言。

现在不但国内，全世界都很注意中国的文化，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话，是很有意义的。



陈翰老和我

陈岱孙

陈翰老和我，说起来是有了72年友谊的老友了。他于1921年和192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1922年转赴欧洲。我则于1922年夏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本科毕业后，转学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有一天我们经当时也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叶企孙先生介绍，相互认识了，从而在哈佛我们算是有了几个月的同学的关系。嗣后五年多我在美国欧洲留学，他则在欧留学，几年后而回国。我们在这一时期没有联系。一直到1927年我返国于秋间到北京清华教书之翌年，在北京城内之东安市场，于无意中遇上了。

东安市场当年除了两条大街由店铺组成外，还有一条由众摊位组成的专卖书的小巷。我进城之日，经常去这个小巷逛看这些书摊。兴尽后，就转去市场大街中一家较大的茶座喝茶休息。东安市场这个旧书摊巷是当时北京东城区最大的旧书市场，有三四十个书摊子，售卖各种类的中外文的旧书刊。凑巧的是，我经常在这些书摊上，或者在这家茶座里，不期而遇翰老。旧雨重逢，赋予我们以畅谈的机会。翰老和我的友谊可以说是在20年代间这几年建立起来的。

但由于下列原因，这几年的时间并不太长。在一段时间后，翰老从东安市场旧书摊上失踪了。

我指的是翰老在这时期的和以后长期的学术和革命活动的结



合生涯。从20年代后至50年代，翰老除了在8年抗战时期，大部分时间在后方生活外，曾经四次被迫流亡海外，历身苏、美、德、日，为谋生而教书当编辑；只是在50年代回国才算定居，我们的友谊才算重新继续。但这时的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巷已消失于无形；而我们似乎也失去这种休闲的兴趣。我们只是有时在某种学术会议见面，几乎没有倾谈的兴趣了。

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记得有一次经团联在大连召集一次年会。他和我都参加了。会期有好几天，我们两个人都被安排在大饭店附近一小屋居住。在这期间旦夕相处，我们常常温起了倾谈的旧梦。

无论是别离或熟悉，这几十年的友谊使我对翰老有了深刻的认悉，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综合教育家、经济学家、历史家和革命者于一身的人。

今日盛会，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翰老表示数十年的敬意和由衷的祝贺。



翰老为我们树立一个光辉典范

赵宝煦

我从干校回来，先回东语系工作，从1973年至1987年，我主持亚非所工作，1978年秋，社科院与北大商量共同筹建南亚研究所，请季羨林先生当所长，我是以季先生为首的联合小组成员之一，所以翰老与南亚所的有些情况我比较了解。开筹建会，翰老都亲自出席，提出好多很好的建议。大家知道，成立一个研究所，特别是两个大单位合办，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翰老一听到，就提出个解决办法，非常关心。另外，一直到1985年，翰老为南亚所带了不少研究生，培养学术研究后备人才，关于南亚所的成立，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感谢在座的陈洪进先生，作为翰老的战友和助手，很多翰老的贡献中，都有陈洪进先生的功劳。

翰老对我们国政系，亚非所也出了不少力，他担任国政系、亚非所的兼职教授，他对我们非常关心，我们不少学生参加了翰老的家庭义务英语班，翰老一共带300多名，其中我们国政系有10多名。这些学生，有的在国内工作，有的出国，前几年，我出去见到他们，他们都还惦记着翰老。我们国政系的开学典礼，几乎都邀请翰老参加，发言，所以，翰老对于北大国政系、亚非所做的工作和帮助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翰老以他自己的学问、道德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自己在学习翰老过程中的几点感受。



第一点，我认为翰老是个共产党员的楷模，他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终身不渝，在经受多种打击下，仍然毫不丧气，翰老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从此，他把一生精力都贡献给振兴中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后来，他参加了第三国际，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文革期间，翰老遭受种种迫害，但他并不因此改变信仰，他至今已90多岁高龄，依然在为人民工作，这方面事例太多了，同志们讲了不少，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在滚滚前进的历史潮流中，翰老永远是清流，坚持不懈地同浊流斗争，作为一个党员，翰老是我的学习楷模，是大家的学习楷模。

第二点，翰老是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楷模。他不仅仅工作很勤劳，而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非常坚持科学性。在当前，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特别强调要学习翰老的坚持科学原则性。在这一问题上，我不想多说，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调查。当时，第三国际一些权威人士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有不正确的看法，翰老不迷信权威的意见，回国后，大搞农村社会调查工作；另一个是关于印度社会性质的学术争论。学者应坚持真理，发扬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刚正不阿精神，翰老做到了这一点。翰老在这两次争论中的表现，完全体现了翰老在科学上坚持真理的优秀品质，这正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必需具备的。翰老的文章我没全读，但从其一些著作目录中可看出，他的文章很少有长篇大论的。另外，翰老是一个理论家，但他的文章中，从不引章摘句，大谈教条。因此，翰老是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楷模。

第三点，翰老对于培养青年人孜孜不倦的精神可贵。今年夏天，有人提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能向未来社会提供点什么？有人说“天人合一”等。但有一位海外学者、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是：“有教无类”，我很赞成。中国封建社会虽存在不少糟粕，但在教育思想中，有不少值得后人借鉴，如“有教无类”，确是一种非常民主的精神。



学习翰老关心下一代

林承节

尊敬的翰老，各位学术前辈，各位师友：

我是历史系教员，受历史系系主任何芳川先生的委托，代表历史系在这隆重大会上发言。

我们热爱翰老、崇敬翰老，不仅因为翰老在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而且他的人品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非常钦佩。我就用一件事来说明翰老关心青年成长、积极培养青年进步的长者风范。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1981年，中国南亚学会在杭州开会，翰老参加了，陈洪进也参加了。当时，四川大学的赵维方先生带着他的两个研究生来参加会议，因为当时川大还没有南亚史硕士学位授予权，因此要到南亚所来申请学位。赵先生就想借会议的光，请参加会议的学者主持答辩会。翰老担任答辩会主席，南亚研究会的几个著名学者都参加了。这两位研究生事先根本没有料到答辩会阵容有这么强大，心里都非常紧张。据我所知，他们头一天晚上连觉也没有睡好。但由于这两位研究生努力学习，赵先生指导认真，论文写得很好，论文答辩很顺利地通过了，翰老在会上给予高度评价。会后，翰老又让我去约见两位研究生。在约见中，翰老再次对他们的论文予以高度赞扬，并指出需要改进的方面，最后，翰老要他们两位分别为《外国历史小丛书》写小册子。一位写土邦问题，一位写鸦片问题。这两位研究生非常激动。几小时



之前，他们还是战战兢兢地担心论文答辩通不过，而今作为南亚史学界的头面人物竟亲自约见他们，鼓励他们，并且向他们约稿，两位真是受宠若惊，激动不已。他们一致表示要攀登学术高峰，不辜负翰老的期望和栽培。这件事对我们与会同志是一个很大的震动，约稿是件平常事，但翰老是个大学者，他向两位刚刚答辩的研究生约稿，这就是一件非同凡响的事了。这体现了翰老的平易近人精神和对知识的高度重视，对青年关怀的长者风范。事后，翰老谈到，这两位学生虽年轻，但成绩大，因此，应该鼓励，给予机会，让他们继续发展。

会议期间，我们这些中青年经常去翰老宿舍造访，聆听他的教诲，翰老也不时来回访。一想起这些，我心里就感慨万分，我们是他的学生的学生，他的回访，就是对我们中青年研究人员的一种关怀、一种鞭策。在同他交谈中，他经常提醒我们要注意学风，做正派人。他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很反感，强调我们做应该做的事，不应该做的就不做，进行抵制。在学术研究上要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我们都牢记在心。

现在，我们历史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面临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这里，我代表历史系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学习翰老关心下一代，努力搞好我们这一学科，使我们历史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最后祝翰老健康长寿。



不停顿地无私奉献

田 森

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参加这样一个盛会，庆祝翰老从事学术、教育活动70周年，我心里充满了激动。

我认识翰老已有40多年了，翰老长我33岁，但年龄的差距丝毫不影响我和翰老的思想沟通。40年来，我从翰老那里学到很多，他的道德文章都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为什么我们能长期坚持接触，这里面有感情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翰老的魅力。那么，什么是翰老的魅力呢？这种魅力来自何处？我以为来自他的精神。什么是他的精神？这里，我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不停顿地无私奉献。这是陈翰笙精神。翰老在少年时代思想有两次大的震荡。一次是在听了黄兴的报告后。那次报告，黄兴讲话非常简短，五分钟就结束了。黄兴说：不反满、不反帝，无以振兴中华，这一思想，在翰老的大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翰老就立下志向，要反清反帝，要振兴中华。第二次大震荡，是在听了一个美国科学家在青年会的演讲之后，他感到只有科学才能振兴中华。这两次震荡，使翰老决心要把自己全部力量为振兴中华贡献出来。后来，翰老到了美国，参加了兴农学会，翰老思想又有一次开化。以后回国之后，我不想多说，他在李大钊身边工作，他的思想又有一个新发展。那就是要为全人类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此之后，无论在第三国际工作也好，在搞中国农村调查工作也好，搞地下工作也好，



解放后从事对外宣传工作，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旋律，那就是振兴中华。为了这样一个目标，他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大家知道，翰老在文革中受尽迫害，讲起这点前，我还想讲几句话：对于翰老的工作，周总理有一个很好的评价。在招待陈翰笙回国宴会上，周总理曾说，我们从各个方面对你进行考察，你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我觉得，翰老对于周总理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在“四人帮”时代，翰老受尽了迫害，他曾经郁愤地说，我真想到天安门广场去点一把火，烧了自己，以唤醒人们的觉悟。他是无私的，因此，他也是无畏的。陈翰笙同志在“四人帮”的肆虐岁月中，他敢于在党的小组会议上批评江青。我敢说，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翰老1971年从干校回来后，身体很不好，两眼看不清楚东西，周总理出于关心、爱护，劝他是否离休。但翰老说：不，周总理，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离休，我要奋斗，我要趴在桌上死去。去年，翰老得了一场大病，刚刚恢复体力不久，他就想到要工作，要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如果他不能继续为人民服务，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他就宁愿死。所以我认为，翰老整个生命的主旋律，就是不停顿地无私奉献，为了振兴中华，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在今天，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泛行拜金主义时候，我觉得提倡无私奉献精神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中国今天面临一种现象是离心力，我们现在需要强化民族凝聚力。怎样才能强化民族凝聚力呢？那就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怎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最有效？我以为活生生地学习典型榜样，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应当提倡陈翰笙精神，学习他为振兴中华，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最后，我祝愿翰老长寿。



我所知道陈翰笙教授的“国际贡献”

史蒂芬·R·麦金农
(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

1976年，我们夫妇初次结识陈翰笙教授，就我们当时正在研究撰写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传记交换了意见。1979—1981年，我们作为外国专家在北京工作，几乎每星期都到东华门大街他家叙谈。80年代初，我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陈教授的生活经历，也收集到了大批有关他国际交往的资料和著作。

我认为陈教授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从事国际活动的杰出的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陈教授可与同时代人如美国的罗杰·鲍德温，中国的宋庆龄女士，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英国的贝特兰·罗莱，苏联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英国的乔治·契威尔、斯科特·尼厄林、哈罗德·拉斯基、R·H·托尼，法国的罗曼·罗兰，印度的尼赫鲁和越南的胡志明等相媲美。这代人从2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早期斗争中，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民主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的看法。陈教授的国际活动就是这一看法的实践。

陈教授的国际活动的成就很多，他至少能讲英语、俄语、日语、德语和汉语等五种语言。而且用这些语言发表了许多著作。他作为学者的声誉至今为众所公认。由于太平洋学会出版了他的一套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状况的系列丛书与论文，他在西方特别



有名。陈教授的著作有力地批驳了洛·白在及其中国追逐者们的论点。如今，像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菲力普·黄（黄宗哲）这样一些学者也承认了他的论文。在陈教授指导下对无锡、广东地区和满洲所作的农村调查研究，至今在西方对1949年解放前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进行的热烈而又持续的争论中仍被用作原始材料，受到广泛利用，并被用以同日本人后来所作的调查进行比较。近年来，西方学者尚不断到北京经济研究所档案室寻找上述调查中尚未发表的资料（特别是有关无锡生丝生产的资料）。

陈翰笙除了学术方面的影响之外，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从事的工作也很重要，陈教授1936—1939年在纽约太平洋学会工作期间，同美国知识界接触广泛而深入，太平洋学会原本是个教会控制的机构，其研究活动从不能触犯现行的社会秩序，而1936年以后，由于陈教授的影响，《太平洋学会季刊》和太平洋学会其他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大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十分关心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陈教授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外交界发挥着影响，经常批驳国民党大使胡适的言论，陈教授由于同30年代初在上海一道工作的史沫特莱，哈罗德·伊萨克斯等人建立了联系，所以同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保持着密切关系，纽约有一大批人（如弗雷德里克·菲尔德，菲力普·杰夫，威廉·霍兰德，布鲁诺·拉斯克，多西·博格，奥尔加·兰格等）都承认受到过他的影响，他对曾同他一道办过《太平洋季刊》的欧文·拉铁摩尔影响最大。哈佛大学的约翰·费尔班克教授在世前，我曾多次同他讨论过陈教授及其在西方的影响。费尔班克教授认可了陈对太平洋学会业务活动的重大影响，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拉铁摩尔对中国（特别是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的看法是受了陈翰笙的影响而形成的。

陈翰笙教授1939年移居香港后，通过工合运动和作为太平洋学会驻港代表所从事的活动，在国际上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此外，他在埃尔西·费法克斯—邱茉莉协助下办的《远东通讯》半



月刊，在纽约，人们认真地阅读和利用，像斯沫特莱、斯特朗、贝特兰和斯诺这样一些新闻记者路过香港时，他均鼎力相助。他作为孙夫人的主要对外联络员在香港从事活动。我认为，陈由于特别同西方人有广泛的联系，作为一名国际联络员在这一时期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不亚于共产党的官方代表廖承志。

在此同时（1939—1942年），陈翰笙实际上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他通过太平洋学会的出版物及香港《远东通讯》半月刊，并更为直接的是他通过同罗斯福总统（1941年）派往中国的使者拉林·柯里施加影响。柯里无论是到中国去还是离开中国，陈都要同他进行长时间的面谈，向他简要说明中国所预期发生的事。我确信，陈教授对柯里向罗斯福总统的中国政策的形成及他对1941—1942年新四军事变和国民党的宣传运动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罗斯福对宋子文、蒋夫人和蒋介石本人日益失去信任是从拉林·柯里的报告（和陈翰笙的影响）开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陈教授回到纽约市，他对西方的影响达到了顶点，陈教授是中国留美学生的高级顾问，又是共产党的代表和同美国党联系的联络员，此外，他还被公认是研究中国经济状况的中国最高学术权威。陈教授那时非常活跃，他在美国所有的重要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琼斯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里都任过教，讲过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内战期间，在美国没有一个国民党人能在学术上同他相比。显然，他促使了美国知识界的舆论转而反对蒋介石及其政权。陈教授还向当时报导有关中国情况的新闻记者（如史沫特莱、斯诺、西奥多·怀特、杨刚）提供大量资料。陈教授在美国国务院和别的政府部门有许多朋友，他经常前往华盛顿。简而言之，他在1946—1949年所起的作用犹如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正式大使。

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陈教授在西方的影响甚微，由于是麦



卡锡时代，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见不着了。他一直同法国的凡尼尔·桑纳保持联系，从而写出了几部有关现代印度的著作。我还认为：通过桑纳，他影响了60年代美、英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复兴。但总的说来，陈教授50年代的国际影响在于同印度建立和发展外交和学术方面的关系，在美国，人们只有在麦卡锡委员会攻击他的老朋友（如拉铁摩尔、史沫特莱、斯诺和太平洋学会的同事们）时才听说到他。

1979年以来，陈教授又在西方引起了对他的著作的兴趣和崇敬。总之，陈教授因其作为学者——特别是作为系统研究中国农村的先驱——所具有的高水平的学术成就，及其作为老一辈革命活动家所进行的毕生奋斗，而在国际上受到高度的尊敬。所以受到尊敬，首先是由于他曾经历的、参加过20世纪中所有重大国际政治社会运动的、最后一位尚健在的中国传人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精神。他的革命活动是超越了国界的。他至今坚持着肇始于1917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理想。



附录二



陈翰笙同志在他百岁华诞 庆祝会上的讲话

我听说我过去写的东西已经出版了，是不是请你们拿到会上来发给大家。哪一位要我在英文方面帮忙的，请他来好啦。我现在年岁已不小了，在没有离开世界以前，我愿意帮忙。我愿意帮忙！有什么东西可以翻译的，请告诉我，我愿意做点事体。我现在没有事体做，觉得很不好。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在英文方面、历史方面帮忙，请来。过去有人来，现在为什么人们不来了呢。现在我年纪大了，不中用了。还有年纪轻的人，他因为学校里边有文凭给他，我这里没有文凭给他，我就倒霉了。我感谢你们，要我今天来，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我还是请大家让我干点事体，因为我不干点事体，我觉得不好。



陈翰笙同志谈《地下工作二十五年》

陈洪进笔记

1925—1950

[为了响应社科院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组1984年1月7日的通知，从3月6日起开始口述参加党和革命的经历。共计经过31次，10月8日口述完毕，11月17日定稿，11月19日复核了全稿]

我于1915年去美国留学，第一年进预备学校，第二年考进了波莫纳大学。在二年级的时候，听到俄国圣彼得堡发生革命，为了想多知道些革命的历史，我在大学毕业前读了德文和俄文，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得了硕士学位。后来，从1922年到192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在奥托·赫契教授那里读了一些俄国革命史，但还没有想到中国怎样才能发动革命。在柏林大学得了博士学位，并在那里遇见了蔡元培，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教授。

在1924年4月到北京大学教外国历史时，我遇到了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里涅维奇，从他那里了解到苏联的情况，听从他的劝告，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常常同我讨论社会史的一些问题。我们讨论得很认真，兴趣十分浓厚，一谈就是大半天，有时到深夜，太迟了我就在他那里住宿。他的谈话使我认识到：社会是必然会进步的，但是如果如果没有革命，进步总是非常缓慢的，人民的苦难会拖延很久。



格里涅维奇介绍我认识当时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从他那里我看到了苏联的一些报纸杂志，因此，我对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些了解，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有所提高。

1924年春，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忙于建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我进北大不久就和他相识了。我的多年好友高仁山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约我同他一起去寻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和北大讲师于树德作介绍人让高仁山和我参加他们刚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

当时，国民党左派胡汉民出了5000元给北大教授王世杰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我和北大英美派教授们熟识，是《现代评论》的编辑之一。大钊同志劝我要和他们在一起，还要继续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不可疏远他们。

1925—1927年

1925年发生的上海五卅惨案，燃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烈火，加深了我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大钊同志派我以《现代评论》杂志编辑的身份去上海，动员英租界印度巡捕罢工。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见到了李立三和陈云两同志。我们预计，要发动巡捕罢工，救济费至少要筹足70万元。可是把各方面的钱数合计在一起，总共还不到一半，距离我们的目标很远。因此，计划没有能够实现，无可奈何，只好离沪返京。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大钊同志和我同时在场。军警向群众开枪，大钊同志头部和双手受伤，群众背着他走出东直门。事后，他要我写篇文章记述这个事件，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我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于《现代评论》第68期（3月27日出版）。

“三·一八”惨案后不久，大钊同志介绍我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见面谈话。加拉罕大使劝我为共产国际工作，我立即答应，从



此，我每月用英文写文章交给大钊同志，由他交给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由他送交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

这时候，大钊同志介绍我妻顾淑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在苏联呆了一年（1926年）。

1926年初，有一天夜晚，地下党员胡鄂公突然来找我。他说蔡和森同志这时正在北京，住在城外一个很远的地方，想找我谈谈，要他来领我去他住处。去后，和森同志和我谈了一夜，谈完时，天已大亮。胡鄂公在另一房间里还熟睡未醒，把他叫醒后，仍由他送我进城。和森同志与我那一夜的谈话，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影响。他谈了广东海丰、陆丰的农民问题。他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对中国革命前途非常重要。他劝我认真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翻身的问题，要着重研究历史和现状。从此，我十分注意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我国的农村经济。

192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掌握政权，当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电邀周鲠生、王世杰和我三人去汉口参加工作。2月间，我们三人同到汉口，被委任为外交部顾问。2月底，大钊同志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立即离汉返京。我托辞父病，去沪侍疾，回到北京。

大钊同志是在1927年4月6日被捕的。在他被捕的前两天，我在东交民巷还同他见面。他同过去一样，一再叮嘱我不要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要用开明学者的面目公开活动。他的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我理解他的意思：我担任的工作是共产国际的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是秘密工作，所以必须同时要有公开的职业。

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我妻顾淑型同志在北京艺文中学当教务主任。我们俩最接近的人，一个是多年好友高仁山，另外两个是北大进步学生，一个是湖南女生张挹兰，一个是历史系的男生无锡人王寅生。王寅生不但是同乡还是远亲，很爱好学习，常常来往。



高仁山是我1920年下半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认识的。高是江苏江阴人，家住天津，在南开读中学，在日本勤工俭学时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创立新中学会。他在美国时曾发起新中学会美国分会。他立志教育救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育系副主任，同时创办艺文中学，实行道尔顿制的教学法，聘任顾淑型教课兼教务主任。艺文中学是个进步学校，教员和学生中有地下党员，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刘仁同志就是在此校毕业的，校址先在北河沿，后在灯市口，就是现在的第28中。高那次同我一起看了大钊同志后，就帮助大钊同志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工作。高一直不知道我和大钊同志的关系以及我所担任的工作。

那时，北京大学有两派在明争暗斗。英美派的头头是胡适，日法派的头头是国民党西山会议的李石曾和历史系主任朱希祖。朱希祖想排挤我，捏造一份由学生具名给北大评议会对我进行攻击的指责信。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对高仁山讲了这件事。我告诉了大钊同志。他指出这是国民党右派李石曾的阴谋。他还说，切不可上当去追查真相；真相大白，反会把事情闹僵，应当找法学院的周鲠生教授想办法。我照他的话办了。周鲠生聘我在法学院教美国宪法史。结果，我在历史系继续教欧美通史和史学史。李石曾和朱希祖想排挤我的阴谋没有得逞。

大钊同志的被害，告密人是李石曾。“五卅”反帝运动后，北方军阀土崩瓦解，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倾向革命。大钊同志派人到国民军中工作，反对直奉军阀。在军阀白色恐怖时，大钊同志转入地下，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工作。一般人不知道他的工作地点。李石曾得到了消息，向奉系军阀张作霖告密，并且献策取得公使团代理首席使节荷兰公使的同意，让武装军警进入东交民巷逮捕了大钊同志。

高仁山和张挹兰也先后被捕。李石曾趾高气扬。奉系军阀派人统治北大，学校一片混乱。我无法任教，随时有被株连的可能。

显然，原来的住处不能呆了。必须立即离开，我和顾淑型搬



到小牌坊胡同里一个偏僻的胡同里暂住。王寅生说，他认识一个日本朋友，名叫铃江言一，可能帮我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铃江言一我早认识，他表现进步，同情中国，认识不少中共党员。铃江介绍我认识另一个日本人名叫中江丑吉。这人的职业是替北京《顺天时报》写社论。当时曹汝霖有不少房产，他为联络日本人，分出一些房屋给中江丑吉住。铃江就安排我住在中江那里。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最后决定先到日本，再从那里去苏联，实现我的理想。中江送我和顾淑型到火车站去天津，再从天津去日本，当时去日本是不要护照的。

到了天津，我们改名换姓，住进了一个小客栈里，说是去上海的。第二天到神户。到苏联去必须领护照。幸好，驻神户的中国领事是顾淑型的一个亲戚。他替我们办了护照。我们乘船到敦贺（Tsuruga），又搭上日本的小客船到海参威。从那里乘火车到莫斯科。

1927—1928年

一到莫斯科，我们就去找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所长伏斯涅钦斯基。原来，我们在北京时就预先联系好了。当时，北京塔斯社主任明欣常来找我解答他不了解的问题，他夫妇俩与我们都很熟识。他知道我要去苏联研究农民问题，就建议我去找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主任伏斯涅钦斯基。大概在我走时，他就去了电报，所以，一见面伏斯涅钦斯基就知道我的来意。他是立陶宛人，体格魁梧，声音洪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同意我参加研究所的工作，立即把我介绍给所里的会计员阿利卢耶娃，说我的生活费就向她领。然后又把我介绍给所里的研究员马季亚尔，说“他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你们可以在一起工作”。

当时，莫斯科住房相当紧张，所以这位所长又帮助我们找住处。他介绍我们认识布哈林的父亲，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他



也没有给我们找到住处，幸好后来我们找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才找到了住处。她在莫斯科近郊有一间空房，是他们夏天休息的地方。房间门窗齐全，其它一无所有，没有一件家具，也没有地板。我们买了些乾草铺在地上当卧铺。每天一早乘半小时的有轨电车去莫斯科，白天在那里工作，吃饭，晚上回到住处过夜。当时供应相当紧张，日用品短缺，纸张奇缺，没有手纸，只能用报纸代替，皮肤和内衣经常沾上油墨。

会计员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夫人，腰宽体胖，和蔼可亲，自从相识以后，见面总是满面笑容。每逢向她领工资，她总是拉住我亲切地问候顾淑型同志，问长问短，她的热情令人难忘。

研究员马季亚尔是匈牙利人。他同我讨论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理由是中国在北宋时期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说，那时期流通全国的商品，主要只有茶叶和蚕丝，那不过是商业资本，只能说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辩论过好几次，都是各不相让。

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情况与欧美的学术研究机关，情况大不相同。欧美研究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有专门知识的学者，而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人员很少是大学毕业，而且都没有做过研究工作，十之八九是被安插进来的一般干部，有的不过是中学程度。同我一起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的几个人，都欢喜辩论，但都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依据。有一次，一个20来岁的青年同我辩论，到了理屈词穷的时候，竟然断定我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意气用事地说：“你读过《资本论》没有？你们中国人是不懂得中国历史的。”我觉得当时莫斯科盛行一种学风：谁能背诵经典著作辩论起来就占上风，不习惯实事求是，根据历史事实，刻苦钻研，我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学风深为反感，对他们任意把那些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一般干部安插到研究机关来的办法，非常惊奇。当时研究所的工作作风很不踏实，也



没有积累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呆了一年，到了1928年夏天，我和顾淑型同志就急于想回国了。

1927年12月间，我在莫斯科经宋庆龄介绍认识了邓演达。他是在九月间国民党宁汉沪三方面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后来莫斯科的。

有一天听说陈友仁和宋庆龄也来到莫斯科，都住在红场附近的饭店里。那里是苏联的国宾馆。陈友仁是1925年夏天在北京认识的。他为了想在北京办一家英文日报，来找我商量办法。可是，不久广州打电报给他要他南下工作，办报的计划作罢了。1927年初在武汉又有过来往，所以很想看看他。他介绍我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同陈友仁讲话用英语，同我用上海话。下午她招待我们喝茶，谈了一些时事。宋庆龄诚恳纯朴，没有教条八股的词藻，流露着革命热情，令人感到亲切。因此，1928年夏天我和顾淑型回到上海时，又去看她，她住在莫里哀路，房子是位华侨送的。

1928—1933年

我回到上海，没有人知道我是从苏联回来的，只以为是从日本回国的。尽管如此，过去在一起编《现代评论》的国民党右派前北大教授王世杰总疑心我是中共党员。当时他在上海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院长蔡元培，建议要我当副所长，王世杰婉言拒绝。蔡先生就介绍我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那里去整理《中国百科全书》的书稿。

幸好，次年（1929年）王世杰被调往南京任法制局局长。蔡元培就去同王云五商量，并得到他的同意，让我在一年合同期满前去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他自己兼任所长。

回想到我在莫斯科同马季亚尔等人辩论时所引起的对教条主义的反感，我就想乘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机会来调查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到研究所，我就聘请北大历史系的学生王寅生



为助理研究员。起初，我们在上海对日本人办的棉纺包身工制度进行调查，那份调查报告引起了反动派对我们的注意。我们提高了警惕，立即转变方向，多做农村经济调查，以避免社会调查夭折的危险。随后，我就同王寅生、张锡昌、张稼夫、石凯福（现名石樵）、钱俊瑞、秦柳方等同志到无锡、保定、潍县、江苏的蒙台子等地进行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地主阶级、军阀官僚、高利贷者和外国商人的剥削，造成我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的破产阻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除实行土地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在上海的时候，由于王寅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潘梓年，谈过几次话。也在那时候，托派彭述之不止一次到我家来同我谈话，他认为斯大林对待托洛茨基是不民主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劝我不要迷信共产党。他的用意显然想拉我参加他们那一派。

那时，邓演达住在西摩路（今陕西路），曾来看过我几次，主要是谈教育改革问题。有两次是和章伯钧一起来的。我们谈得很融洽。

我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全所经费是很有限的。我们尽量把经费用在农村经济调查方面。因此，我们计划进行的剪报工作，经费就没有着落。但是，要了解全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剪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碰巧，我有一次同当时铁道部长顾孟余谈话，从铁道部弄到一笔钱，剪报工作才能进行。顾孟余是在德国学经济的留学生，在北大曾同事两年，比较熟识。他问我月薪多少钱，我说大洋400元。他还问我够用不够用。我说，我们夫妇都有工作，又没有孩子，当然够用。不过，社会科学研究所打算订阅期刊报纸，却缺少这笔经费。顾马上说：“你就算是铁道部的顾问，月薪400元，够不够？”这样，我们就请了李沧江和曹轶欧担任剪报工作。那时，曹轶欧和康生都在上海大学。李沧江是江苏省宜兴县人，后来参加洪湖赤卫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了。



有一次，我到莫里哀路去看宋庆龄，遇见美国人史沫特莱女士。她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驻华记者。她告诉我她住在霞飞坊，要我到她那里去谈谈。彼此熟识以后，就常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和时事问题。她常把她写的通讯稿拿给我看，要我提供意见。她从我处了解到当时蒋政权的内部矛盾和反共媚外的情况。因为，我当时常常见到国民党官员如陈公博、顾孟余、唐友壬、朱家骅、段锡朋、何思源之类的人物，所以能够了解统治集团的内幕。可是，史沫特莱当年就被《法兰克福日报》社解雇了。后来听说，这是政学系丁文江和胡适破坏的结果，他们请求德国驻沪领事要该报社停止她的工作。

当时，第三国际太平洋劳工组织在上海办了一个英文周刊，叫做《上海新闻》，我和史沫特莱常用笔名在这个周刊上发表文章。史沫特莱常到宋庆龄那里去，也常和鲁迅谈话。我和鲁迅见面谈话是宋庆龄介绍的。见面时我说，我就是他在《语丝》上提到的“吾家世兄”。他听到了，哈哈大笑。由于我和邓演达谈得来，邓又在宋庆龄面前常提到我，所以，宋庆龄、蔡元培和杨杏佛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的时候，有时要我护送难友脱险或送交信件。1931年6月15日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劳动会议干事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第三国际请了一位瑞士律师来上海为牛兰夫妇辩护。我曾几次把宋庆龄的信件送交那位律师。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一人送信，另一人远远在后随行，准备一人遇险，随行者可以了解情况。记得有一次，我去《申报》馆送交民权保障同盟的信件，随行人是谢树英。他是德国留学回来的，现在在北京钢铁学院当教授。

杨杏佛是邓演达的好朋友。我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些出版物和几次实地调查，多亏总干事杨杏佛的努力才能实现，否则是不可能的。有一次，我从宋庆龄那里出去，五分钟后，杨杏佛去看她，问她刚才是谁来的。宋就没有告诉他是我在那里。邓演达被捕后，蔡元培用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写信给陈诚进行营救。蔡元培要我办这件事，我找了彭学沛带我去见了陈诚。



当我在上海的时候，史沫特莱曾经提出要同我结婚，我告诉她我已经结婚。过了两个月，她告诉我她已经和左尔格结婚，要我认识左尔格。一个星期后，有一天早晨我去看史沫特莱，看见左尔格也在那里，知道他们已经住在一起。后来我知道左尔格是苏联杰出的情报工作者。我还因史沫特莱认识了在上海满铁研究所工作的尾崎秀实，他是和左尔格一起工作的。有一次，我跟左尔格提到了孙冶方。左尔格愿意见见他。我约了孙冶方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见面。可是，出乎意料，孙见到左尔格时用俄语问好。左尔格装作不懂，赶快告辞了，对我说以后也不见他。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孙冶方。左尔格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精通德语、俄语、英语。他用美国记者名义在上海收集情报，并伪装成纳粹分子结识了上海的德国领事和南京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的人物，他在上海从白俄总部倾听白俄流亡者的谈话，左尔格在上海只讲英语，不能暴露他懂俄语，也不让人家知道他认识我。我和左尔格联系是通过尾崎秀实。

1932年1月左尔格通过尾崎秀实给我一封信，要我陪他到西安去一趟。约定在某天某时手提打字机在徐州火车站候车室等他一同乘火车去西安。我们到了西安，找了南汉宸（陕西省长杨虎城的秘书），第二天南汉宸招待我们午餐。过了三天，左尔格要回上海。可是得到消息，当地发生瘟疫，火车客运在潼关断绝。左尔格在西安弄到一架由德国人驾驶的军用飞机，把我们用飞机送往洛阳。到了洛阳，我们分手，他回上海，我乘火车去太原到五台县去看冯玉祥。

我在美国时认识了查良钊。返国后，查良钊与高仁山一起创办了艺文中学。当时，查良钊在冯玉祥那里。我去看查良钊，通过他认识了冯玉祥和李德全。李德全谈话较多。在那里还看到薛笃弼。目的在于了解冯与闫锡山之间的矛盾，住了一个星期就回上海了。

我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当时是谁也不知道的，可是中央研究院



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老是不放心我，一直注意我的一举一动。有一次，他对他的同事们说：“陈翰笙这个人，看样子不像是个共产党员，听说，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南京，还特地在无锡下车上坟扫墓呢。”但是，为了便于控制。后来，他终于说服了蔡元培让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上海劳利育路搬到了南京鸡鸣寺。

我到南京不久，国民党CC派头头陈立夫就要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团去作一次演讲。这是我到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去看院长蔡元培时，蔡先生告诉我的。我流露出内心的厌恶。他怕我为难，就说道：“好在你可以自己出题目讲，还是去的好。”我想，既然非讲不可，我就选定了“田赋与田租”的讲题。我站在讲台上讲，陈立夫坐在主席位上听。讲完后，他送我出大门，边走边说：不用害怕出什么财政问题。他举起双手作出倾盆大雨的样子，说：“我们可以发行许许多多的法币，毫无问题。”我听了他的话，心里好笑。我早已深入研究了国民政府财政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从中国银行研究室主任唐有壬和他的助手张肖梅（女）了解到蒋、宋、孔、陈从公债里捞到了大量钱财，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垮台的，我只好一言不发忍笑而去。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是很头疼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了敷衍他们的面子，在我们所写的《兵差与农民》书名上加上了“中国北部”的字样，其实内容并不限于北部。我们在1932年和1933年所写的《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调查报告，被傅斯年扣下，不但不让发表，连原稿也不知下落。1933年6月18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被暗杀。我在中央研究院孤立无援，而且研究工作已经遇到了障碍，不可能有何发展，因此，我向蔡元培院长提出辞职要求。他很谅解，给了我一个通信研究员的名义，从此，结束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

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王昆仑策动孙科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做一些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工作。计划没有完全实现，但



他说服了孙科与我接触。我于1933年10月间在南京看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理事长孙科和总干事马超骏。他聘请我任该馆特约研究员，我提出了广东农村调查的计划。当年11月底开始用中山文教馆、岭南大学名义在广东进行调查。宋庆龄知道了这件事，就建议我先从中山县开始。她给我介绍信去看中山县模范县长唐绍仪。这个办法果然生效。中山县开了头，其他各县就毫无障碍，并以此为荣。调查时正是陈铭枢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时候。团员中有王寅生、孙勉之（即孙冶方）。薛雨林（即薛暮桥）也曾加以协助。调查报告《广东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于1934年出版，后来曾有两种日文译本。

广东调查使我对军阀统治的认识和香港与军阀互相勾结的历史知识有所提高，还发现了有关袁世凯的史料。我在沙面遇见一位美国副领事，经过攀谈，才知道他还是我在美国波莫纳(Pomona)大学的先后同学。我问他，能不能让我看看领事馆的档案。他说，可以看，但不许抄写。我发现袁世凯的二三事，给我深刻印象。(1)袁世凯曾派人在广州垄断军火进口。(2)袁世凯有个英国人当他的私人医生，其实是个英国特务。袁世凯也知道，将计就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袁世凯通过这位英国医生秘密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献策，要英国出面在天津召开八国联军代表会讨论撤兵办法，同时向西太后推荐袁世凯主持和平会议。这件事说明军阀投靠帝国主义的祸根早就陆续埋下。

1934—1935年

1934年2月，我从广东回到上海，觉得中山文化教育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多大希望。我决定从孙科处取得特约研究员的名义，加上我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名义，去日本东京东方文库研究中国经济史。这不过是我的公开职业。去东京前左尔格与我约定，他也去东京，要我专与满铁株式会社里的地下共产党员



来往。离开上海前，我同茶叶专家吴觉农商量，共同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我请他在我不在上海的时间，代理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的职务。此会还创办了一个月刊，名叫《中国农村》。

1934年春，我和顾淑型同志在东京租了处小房子住下。我常到东方文库去看书。东方文库的书籍原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詹姆森的藏书，多半是欧美传教士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著作。原先存放在北京，后来被日本人买去了收藏在东京。我打算利用它来研究中国经济史。那时我国驻东京的留学生监介绍我认识了郭沫若。在东京的交往，最令人难忘的是郭沫若。每次会晤，常常畅谈。记得那年年底，他邀我吃晚饭，畅谈痛饮，我喝醉了躺在榻榻咪上熟睡不醒，他打了电话后，顾淑型来接我回家。有一天我和顾淑型在东京街道上看见了左尔格，可是彼此不打招呼，装着互不相识。我的秘密工作是通过尾崎秀实与满铁的共产党员联系。可是他们有些人是在上海的，因此上海的一些外国朋友是与我联系的。有一次，已经约定1935年3月某日在东京百货商场与上海来的人见面，可是到了那天，不见他来，我不放心，所以回上海来看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从神户乘船到上海找史沫特莱就有分晓。那次，在船上遇见《大公报》经理胡政之，交谈甚洽。在船上看英文《字林西报》上有消息说有个国籍不明的西人在上海被捕，从他身上搜查出三个护照。我大吃一惊。因此，一步不离胡政之，同他一起上岸，一起进新雅旅馆，一起登记，但没有定房间，马上到霞飞坊去看史沫特莱。她一见到我就大声喊叫“天大的幸运，你来了”。“从这时起，不许你出门”。到了晚上，她送我到路易·艾黎（Rewi Alley）那里，同他工部局的同事英国工程师钱普林（Chamblin）住在一起，那里是有客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艾黎。他早在30年代就同宋庆龄保持密切的关系。由潘汉年领导的地下党电台，就设置在艾黎的寓所里。史沫特莱把我送到那里，可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我在那里大约住了两个



星期。

到上海的第二天，史沫特莱建议把顾淑型接来，由她安排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我因为顾淑型的身体不好，一人行动不便，而且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回来，所以就请王寅生去东京接她来上海。顾回上海后住在工部局一个德国工程师名叫哈姆布尔格（Hambury）夫妇寓所里。不到十天，史沫特莱就办好了去苏联的手续。艾黎送我到一艘停在海关附近的苏联轮船，同时由哈姆布尔格夫人送顾淑型上船。我们两人被关在船长的厕所里，站了足足两小时，等船开出吴淞口以后，才把我们放出来。到了海参崴，有两位苏联人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到莫斯科不久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有两位苏联人陪我们在红场上观礼。1927年，我们两人曾在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看到了斯大林夫人阿利卢耶娃，这次，在红场上又看到斯大林本人。观礼完毕，他们送我们回旅馆。

过了几天，忽然有人来带我到一个办公室去谈话。一个穿军装的人和我谈话。他首先问我，当一个共产党员第一责任是什么。我答：服从党的指示。他说，不对，第一是按月交党费。接着他就说：“你是参加过太平洋学会的人。”现在他们的总干事爱德华·卡特（Edward Carter）曾到苏联太平洋学会苏联分会，要分会推荐一位学者去美国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编辑英文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季刊。苏联分会找不出人。但我们知道，去年在加拿大开会时，有个中国学者叫陈翰笙，他可以担任这项工作。”接下去，这位军人说：“本来我们打算派你们两位去美国工作。可是，原先在上海编英文报《中国论坛》（CHINA FORUM）的易乐生（Harold Lissacs）现在回美国去了。这是一个美国托派人物，他认识你。因此，现在你们如果去美国，就只能把你们转到中国党里去了。就这样，我和顾淑型就被送到王明和康生那里去了。那时候，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



1935年11月底，我们夫妇两人去看王明和康生时，他们两人在卧室里谈话，告诉我们，我们两人已经转入中国党内。

1936—1939年

1936年2月间，康生告诉我：“纽约太平洋学会要办《太平洋事务》季刊。季刊总编辑是英国所赏识的美国学者。总干事卡特到几个分会去找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分会都找过了，都找不出人来。想来这是故意要来苏联找人。借此可以拉拢苏联分会。现在我们和苏联打算推荐你去。我们打算这么说：“听说你现在在巴黎，所以要卡特到巴黎去找你。你们现在就要准备走，去巴黎。现在卡特在伦敦，5月间回纽约。所以，你们4月初就应当去巴黎。卡特5月初可能到巴黎来看你。”我到巴黎后就写信给卡特告诉他我从中国来到巴黎。我们从莫斯科去巴黎时还带了一个青年去巴黎，因为他不懂外语，没有人带，旅行会发生困难。他就是吴克坚，是去巴黎到《救国时报》社工作的。我们到了巴黎以后，还到瑞士去了一趟。卡特给我来信，要我们马上到英国去与拉铁摩尔见面。4月底我和顾淑型去伦敦。不久，卡特和他的秘书、拉铁摩尔、爱尔塞·丘茉莉和我们夫妇两人一行共六人乘船去纽约。5月25日到达纽约。

我还记得，在我们离开莫斯科之前大约两个星期，康生对我们讲，要我们在美国不要让人家知道是党员。这样才能配合饶漱石的工作。当时饶要到纽约创办《华侨日报》。打算把在法国的《救国时报》停掉，把那儿的铅字搬到美国去办《华侨日报》。同时，康生还告诉我，杨度也在上海加入了党，人家都不知道。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也是我们党的同情者。他还说，在纽约可以同冀朝鼎合作。在离开莫斯科前，有一天潘汉年同志到旅馆来看我们，他说：“以后有什么事要同党联系可以通过宋庆龄，好在你们在上海就已经很熟悉。”那次是我同潘汉年第一次见面，我在上



海和潘梓年同志交谈过几次，所以彼此了解。

我们5月间到纽约。一到纽约，冀朝鼎果然就来看我们。他在纽约办了一个英文月刊。他同纽约太平洋学会的人如卡特等也很熟悉。

我们到纽约不久，遇到了陶行知和跟他一起工作的陆瑾。陶行知是国内群众团体派到美国做民间抗日宣传工作的。陆瑾是他的助手。不久，陆瑾就和饶漱石结婚了。过了半年，铅字才从法国运到纽约，我们就同徐永煊、陈其璜、唐明照组织《华侨日报》社。从到纽约时起，我就参加了《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工作。我和威廉·霍兰（William Holland）接触较多，同拉铁摩尔接触较少。霍兰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每逢苏联外交家和知名学者来纽约，都是卡特、霍兰和我接待。霍兰和丘茉莉都不是共产党员，但都同情苏联。1937年2月，我应加拿大五个太平洋学会分会的邀请到加拿大的中部与西部五个城市作公开演讲，详细解释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同年夏季我被波莫纳大学邀请，在夏令学校里，讲中国政治六个星期。我乘这个机会尽量揭露蒋介石的政治面目。这时候，我和顾淑型两人在纽约参加了救济战时难童募捐委员会。

1939—1942年

1939年5月，我们离开纽约去香港。路过菲律宾在马尼拉呆了一个星期，同菲律宾朋友接了头，5月底到香港，当时宋庆龄和梁淑德曾到码头上来迎接我们。

有一天，廖承志告诉我说，潘汉年要来看我。我对他说，我同他接头好了，不去看潘汉年。我知道廖承志是公开露面的，潘汉年是隐蔽的，我不应当暴露我的党员身份。后来，我跟潘汉年联系都是通过朱伯琛。我在香港露面做了两件事：（1）办了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这是胡愈之到香港同我接头创办，由国新社发行的。每期用航空寄发各国。这个刊物最早把皖南事变（1941.



1.) 报导国外。后来叶挺经过香港去延安，经孙冶方介绍曾来看我，表示感谢。(2) 我帮忙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香港主教英人何明华为主席，斯诺和艾黎为委员，我担任执行秘书。两年内收到的捐款约有1800万美元，捐款都来自海外，大部分来自北美、西欧和东南亚各地外国人士和华侨。在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 12. 8)那天晚上，菲律宾马戏团正在香港演出，义演收入大部分捐献给工业合作社。收到的捐款都分配给抗战后方如江西、福建、安徽、河南、陕北等地工业合作社。我还记得汇给延安的款是李富春同志签名收的。我们的汇款都是经过廖承志姓邓的亲戚通过银行办理的。回想起来我在香港认识了不少人，除国民党人士外，印象较深的是夏衍(沈端先)、范长江、金仲华、张铁生等。

香港沦陷(1941. 12. 18)一个多月后，我和顾淑型乔装店员搭乘难民的轮船，于1942年2月初离开香港，经过台山、开平、梧州到达桂林。

1942—1946年

我在桂林同张锡昌和简竹坚一起编《工合月刊》，还帮助顾淑型办了一个妇女工业合作社。就在这时候，重庆工业合作总社派了孟用潜来帮助我们开展工合运动。1942年底，我为了工合工作到了江西赣县看了工合办事处主任陈志昆，以后，还到了福建漳州。回到桂林以后，应桂林师范学院院长林砺儒的聘请，任该院西文系主任并兼了些课。我刚到桂林不久，从香港来桂林的张友渔同志要给我100美元，说是党给我的，我没有收。还有从前在美国认识的上海中国银行研究室的张肖梅(政学系张禹九的夫人)送给我法币6000元，我婉言谢绝。我说，我将在桂林师范学院授课，可以不需要钱。我在桂林两年间常到国际俱乐部去看看来往的朋友，其中有李四光、戴爱莲、田汉、萨空了、柳亚子、丁燮林等



人。1942年11月，桂林举行苏联十月革命纪念会，我和杨刚请了英国驻桂林的代理总领事布赖恩（Derer Bryan）在大会上报告英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情况。

那时候，蒋经国在赣县，常从赣县到重庆去看宋美龄，因为他有个姓章的情妇在桂林，所以中途在桂林都要住几天，间或在国际俱乐部里看见他。有一次，看到蒋经国屁股坐在写字台上，两腿挂着，同一个会讲中国话的美国记者谈话。还有一次，看见这位美国记者在浴室里替蒋经国洗脚。

当时，桂林有个英军服务处，头头叫做赖德上校（Connel Recstle Ride）。因为当时有数百名英军困在汕头，这个机关是为英军服务的。因丘茉莉的介绍我认识了赖德。赖德要找一个懂日文的中国人去帮忙，我就介绍了孙亚明（中共党员）。我还认识美国驻桂林的副领事，是个自由主义的记者，叫做查尔斯·塞维斯（Charles Seruice），他也是我们母校波莫纳大学毕业的。他要找一个中文秘书。我介绍了杨承芳（中共党员）。那时，我和党的联系是通过李亚群。他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统战委员会书记。我和李亚群来往是不让人知道的，谈话都在野外树林里。解放后，1952年我在北京还同他见过面。那时，我的外甥女孙少礼在桂林美国新闻处工作，由于她的关系，我认识了美国新闻处处长史密斯。

有一天陈此生来看我，要我第二天到他那里去吃早饭，说有事要和我谈谈。我到他那里以后，还没有吃早饭，他就拉我走出房间，在室外空地上，坐在拆掉了房屋的石基上。他低声对我说，重庆军事委员会有密电给桂林军委会办公厅，要逮捕一批人，名单里有我。他劝我赶快离开桂林，最好出国到美国去。我回去就和顾淑型商量。第二天，我和顾淑型就到全州暂避。同时，托顾淑型的姐夫孙树珊设法帮我们办去印度的护照。当时孙树珊在重庆当交通部参事。护照上用的都是假名。还在桂林托人找了一家商行作领出国护照的保证人。在张锡昌那里工作的简竹坚（现在在香港任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给了我600美元，作我们去印度的旅



费，护照办好，我们从全州回桂林。英军服务处的赖德上校帮我们同印度新德里英国新闻部远东局联系好，让我们两人在那里工作。经过桂林英军服务处和桂林美国新闻处的帮助，我和顾淑型乘上英国人驾驶的汽车到达昆明。第二天早晨，我和顾淑型看了早年的同盟会会员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在他那里吃了早饭，就乘人力车去机场。英国驻昆明领事馆为我们安排一架小军用飞机，飞往印度加尔各达。下了飞机，在通往市区的路上，顾淑型听见中国人群中有人说中国话：“他妈的，到这儿来了。”当时驻在加尔各达的中国机关很多，重庆派来的特务也很多。我在加尔各达不到一个星期就去新德里工作。在新德里不久就认识了德里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来希（Curashi）教授（后任巴基斯坦教育部长）。他邀请我在德里大学历史系任入学考试评卷员。我还加入了印度的历史学会，两次出席他们的年会，因此，有机会游历了许多地方。我在新德里认识了印度历史家潘尼迦，常常接触。后来，他当了印度第一任驻华大使。1945年9月和11月，我在印度农村作了些调查访问，认识了一些印共学者，如南方的南布迪里巴德（E. M. S. Nam—dildiripad），孟加拉的安必加·高士（Almbia Jhosh Jopsl）和戈帕尔·哈达（Jopsl Haldar）。他们提供了一些材料，有一部分我把它列入我所写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1948年英文本）的注释里。在新德里，我常遇到一些过路的新闻记者，如杰克·塞维斯（Jack Service）就是其中之一。康生那时在延安，曾经两次通过美国记者给我带党内文件。那时，我与康生还有点来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一年，前桂林英军服务处处长赖德上校将去澳大利亚任墨尔本大学校长。他邀请我去当教授。可是，正在这时候，1946年秋天，英国记者彼得·汤森（Peter Thownsend）从北京带给我由周恩来和廖承志两同志署名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我直接去美国，不必回国。所以，我就婉言谢绝了赖德的邀请。



1946—1950 年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美国，这次在那里呆了4年。在这4年间，我曾在美国中部调查了美共在农村的影响。通过詹姆斯·艾伦（James Allen）了解美共的内部问题。我曾同唐明照、徐永焜、徐鸣等一起参加留美党员座谈会；同浦寿昌、俞沛文、浦山等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夏令营；我还参加薛葆鼎主持的“建社”座谈会。那时，我还和脱离了美共的党员，如苏开明等人取得联系，我每周写信到香港与乔冠华联系。

我到美国后，先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聘教授，讲中国历史半年。后应拉铁摩尔的邀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参加新疆史地研究工作。后来出版了《亚洲腹地边疆》这部集体著作，结束了那项研究。一年以后，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印度历史研究员约两年。以后，应纽约亚洲研究所聘请，担任教授，每周讲课一次。

由于从前认识的太平洋学会的美国友人介绍，我认识了詹姆斯·艾伦，通过和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 Field）认识了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同福斯特见过几次面。

冯玉祥和李德全从旧金山到华盛顿去看前驻华武官马歇尔时，在他和拉铁摩尔会面的场合，我和冯玉祥、李德全来往过几次。我们还谈到他们当年被困在山西的情景。据后来杨刚告诉我，当时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认为我们不应当让冯玉祥去看马歇尔。章汉夫以为冯玉祥之所以到华盛顿去看马歇尔是由于我们没有阻止他。我问杨刚，冯与马歇尔是老朋友，为何不能去看，看了有什么不好。章汉夫怀疑冯玉祥想取得马歇尔的帮助，东山再起，其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1950年在纽约时，我常同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卜卜维奇（Popovitch）讨论国际问题。他认为苏联在与南斯拉夫贸易协定上



的货物价格是不公平的。到了1951年，他被任命为驻华大使馆第一任代办。

1950年春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来了两个人问我何时回国。我答：我与纽约亚洲研究所有合同，明年合同期满才回国。他还问我，听说冀朝鼎被派到旧金山中国银行当行长，有没有这事。还问我同史沫特莱有没有来往。我说，在上海见过史沫特莱，以后没有见到过。事实是：徐鸣从纽约回过北京一趟，返美后带给史沫特莱2000美元给她作来中国的路费，这笔钱是我亲手交给她的。

1950年10月我和顾淑型从纽约乘船到英国。签证是由南斯拉夫的卜卜维奇帮忙办理的。到了英国，我去剑桥大学看了拉铁摩尔等人。一周后，乘飞机到捷克，在那里见到了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伍修权、龚普生、乔冠华、浦山等同志。他们启程后，我们就转入波兰。在波兰呆了一个月，等候苏联的签证。取得签证后，我和顾淑型经过苏联回国。到达北京的时刻是1951年1月31日晚间。从此就结束了我25年的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二十五年》读后记（一）

薛葆鼎

陈翰笙同志平铺直叙地口述了他《地下工作二十五年》经过，也就是说他谨记李大钊同志的亲口嘱咐，开始以开明学者的面目公开作学术活动而担任共产国际的秘密情报工作，以后又为我党工作，至今已过60年了。

他1915年去美国求学是从园艺学转地质学开始的，当时他是受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使他攻读历史学，并运用英文、德文、俄文等作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工具。

有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之后，他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1924—1925年同苏联朋友们的来往中，从《资本论》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思想转变后，在李大钊同志介绍下，为共产国际做秘密情报工作。后来到1935年，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思想转变后，接受了李大钊同志的亲自领导，并受了蔡和森同志长夜密谈的影响，他就开始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逐渐同蔡元培、陈友仁、宋庆龄、邓演达、杨杏佛、冯玉祥、王昆仑等，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还同国民党的《现代评论》派、改组派等也保持一定的关系，为他后来的工作开展（如参加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和为史沫特莱提供中国国内材料等）都起了很大作用。



陈翰笙同志为人最可贵的便是“接受了革命的理论就想方法亲自实践”，并“运用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刻观察现实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且“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六十年如一日”。他多次饱尝惊险、流亡国外而矢志不渝。

30年代初，他倡导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中国农村调查，明确中国“除土地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创建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培养了王寅生、张锡昌、张稼夫、钱俊瑞、孙冶方、薛暮桥等一代经济学家，开辟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30年代中期，他开始利用“太平洋学会”，和冀朝鼎、徐永煊等同志一起作了大量的国际宣传工作，还做过罗斯福智囊拉铁摩尔等的工作，其后对美国对华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

30年代以来，他在香港同宋庆龄、斯诺、艾黎、英国主教何明华等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将巨额的海外捐款直接送到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到延安的由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签收。他同时在香港编辑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最早把新四军皖南遭伏击真相直接向国外报导，引起了国际进步舆论对蒋介石法西斯暴行的谴责，促使蒋介石那次反共阴谋不得有所收敛。其后叶挺同志被释后为此向陈翰笙面谢。

香港沦陷后，他在桂林向国外记者捅开了廖承志同志被蒋介石秘密逮捕的消息，为何香凝、宋庆龄出面营救创造了条件，为此何香凝画了一树老梅给他表示谢意。他在桂林与杨刚同志举办十月革命纪念会，宣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浪潮，受反动派注意被下令通缉，得国内外民主人士掩护而出走印度。

40年代中期，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国支持蒋政权发动内战，而且直接参与战争，大有使中国沦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时，陈翰笙根据党的指示，从印度去美国，他运用多种方式揭露蒋政权的腐朽，宣传美国援蒋反共的政策，必然是走进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死胡同，虽然那时决定美国政策失败的因素很复杂，但后来在美国一些政治家中间却盛传：“‘美国失掉中国’是因为白宫轻信了一



派学者的言论，而那些言论就是来自陈翰笙”。这种流言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在美国宣传工作的效果。

40年代后期，“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是全面开展国际宣传工作的时期，为了配合国内进行的解放战争，那时陈翰笙在美国上层社会和高级知识分子间很活跃，言论之简洁，行动之敏捷，带有学术性的说服力，使一些国际政客也为之心折。他轻描淡写便对冯玉祥、王昆仑作了有力帮助，帮他们下决心回解放区。

50年代初，他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排除阻力，取道欧洲，经西伯利亚回国。当同周总理谈话时，他自愿当外交部顾问继续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将成果提供制订外交政策时参考。

事隔多年，陈翰笙同志已年老并接近双目失明，仍坚持在家设帐授徒，至今仍坚持着当年对苏联教条主义、政策僵化的批判，我认为他秉性耿直、疾恶如仇的可贵作风，不逊于孙冶方同志。

《邓小平文选》出版后，他倾听着家人为他诵读并亲自为《邓选》编成全书的索引，则是中国这位老学者对当前中央衷心拥戴心情的流露。

这些都不愧为胡耀邦总书记所评赞的“这是一个好老头”。也是值得中国学术界推崇的。

当然，他过去为共产国际所做国际情报工作和为我党事业奔走所涉及若干具体情节都很重要，应纳入党史资料。



《地下工作二十五年》读后记（二）

薛葆鼎

（1985年1月7日上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委员会邀请，薛葆鼎同志在社会科学院老干委接待室（五号楼）谈了陈翰笙同志的革命生涯。老干委赵峰、郭静、田野、吴应文同志及邢若筠同志在座。老干部处王同志负责录音，世界历史研究所霍伟记录。

本稿由霍伟根据记录及录音整理。请以薛葆鼎同志正式审阅稿为准。）

老干部委员会的郭静、吴应文、田野三位同志专程到我家来，要我谈谈我所了解的陈翰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如此重视，委托我们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处把这个工作进行好，我更是义不容辞，非跑来讲讲不可了。你们提出让我写，我近来实在没时间，还是讲一次好些。

我听到陈翰笙的名字是在1934年，当时国民党左、右派中很多人都佩服他。他学识渊博，谈笑风生，真是一代风流！

他比我大整整20岁。我知道他，不是从共产党员这里，而是从国民党太子派孙科系统那儿听来的。我同他们（太子派）中的一些人是有来往的。我的亲表兄王昆仑是太子派的骨干，我从他的嘴里听说了陈翰笙，还听他讲了些蔡元培的事情。



我先从国民党左派中知道他的名字，以后在右派中也听到讲他，国民党左、右派中许多人都佩服这位大学者。那时他还很年轻。

他是1924年回国的，是当时北大有名的“娃娃教授”，他当教授时才27岁。据说他那时很灵，谈笑风生，和他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还是有股风度，还是喜欢开玩笑，但毕竟老了。

以后，我是从张锡昌、狄超白两个经济学家口中知道：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他是头一号的理事长，带出了一大批、现在应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带出的人不是10个20个。每次出去，他都要组织三五十，七八十人去搞大规模的调查。那时在农村中进行这样的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采用的完全是欧美式的方法，他就是运用欧美的这一套在国民党统治区中搞，人家国民党拿他一点办法没有！他是得到蔡元培、孙科、宋庆龄的支持的。他带人出去，是以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名义，得到官方的支持。那时土地革命已经开始，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如《农村调查》、《中国土地革命问题》等在苏区中已经发表，思想已经明确了。但国民党内当时是一塌糊涂，对这些东西严加封锁。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这样几派言论：托派言论说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国民党言论是农村复兴的理论；平民教育会、梁漱溟的理论是乡村建设派……各种谬论很多。这时陈翰笙组织这样一大批五六十人的学者队伍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是引起很大震动的。他们从无锡开始，到河北保定，到山东潍县，然后在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后到广东的中山县调查，这是很厉害的。我那时还不认识他，实际上在我知道他时，他已经流亡国外了，所以要了解他不大容易。我主要是从他的学生张锡昌、狄超白和以后的孙冶方那里了解他的，这些人都称他“陈先生”，这不是同志间的称呼，是对老前辈的称呼，是尊重他的意思。等到后来我想进一步了解他，地下党的有些同志告诉我不要问，问不得，我才知道里面有名堂。

我比他小20岁，对他早年的事不十分清楚。我认识他很晚，我



到印度时听人说起：这里有你们的一个陈教授在做经济调查。我去印度也曾有意识地了解印度的政治、社会生活，他在那儿却已搞了一年多了。在南亚，他不仅对印度的社会十分了解，对各个时期的变革十分清楚，还很熟悉印度的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很复杂，同我们封建社会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意思是一样的……他对印度的情况研究得很透彻。我后来在美国听到美国一些人说起：对印度历史的了解要首推你们中国人，美国人不行，我们没历史，不能和你们相比。

从1946年开始到1949年，我同他有了直接的来往，也是因海外宣传工作的关系，我们有了组织上的来往，那时同他接触较多，有些我们不大清楚、不大有把握的问题，去向他请教，很快，有时就在几分钟之内，一个电话出去，消息就回来了。一个题目给他，很快就能得到回音。在美国上层社会、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他是路路通，关系很广，所以很厉害。那时我们也是年少气盛，觉得自己也不错嘛！但同他一比，差远了，真是娃娃遇上老人家！确实相距甚远。而从美国朋友嘴里对他的评价：“你们中国人能在太平洋学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般人中受到钦佩的，不是胡适之，而是冀朝鼎与陈翰笙。”这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评定，而是洋人嘴里的评定。冀朝鼎财政上有一套，陈翰笙学术上有一套。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以后在工作中，来往多了，我了解他多了一些。大概是1947年，冯玉祥来美国，王昆仑来美国，对此我们很慎重，怎样同他们来往都在事先经过仔细的考虑。而在他老人家却方便得很，轻松愉快，随口应答，在随便的聊天中，便非常轻松地将工作做得很圆满，是那样的敏捷，那样有说服力，这是具有学术性的说服力，不是空泛地说我劝你怎样……而是根据事实，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根据人心向背，根据历史发展条件，根据你冯玉祥的为人，根据你王昆仑的为人，我替你打算，还是怎样才好……分析得合情合理，说服力之强是少见的。



所以那时我更了解了 他一点。我常到他家里去，听到他夫人顾淑型说他，顾很喜欢讲他一些琐碎的事情，讲得很详细，这样我对他就有了更多的了解。

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我们隔绝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再去看他。这时顾淑型已经去世了，感到他很孤独，心情也完全不一样了，同我在美国时认识的陈翰笙完全不同了，年纪也大了，照我估计他是受“文革”的刺激太大，反正也豁出来了，什么话都讲，指名指姓地骂江青，骂张春桥，骂姚文元，王洪文不大提（因他很少在报上发表文章），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严密得很，什么风也不透，嘴里是不会露出一一点痕迹来的，所以那时他做什么别人都不大容易知道。等到“文革”挨整后，顾先生去世了，他年纪也大了，性格倒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变得很容易暴露思想了。他不畏权势，不管你是谁，尽管你“四人帮”都在台上，江也好，姚也好，都不怕。他不愿做高官，就想多做些学术研究。他重教育，收徒授课。比如刘少奇的女儿当时找他学英语，他说：我陈翰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免费收学生。刘少奇再有问题，子女无罪。既然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进学校读书，当然也能到我这里来听课，我教！当时很多来找他的被斗老干部的子女他都收留，义务授课，办了三个班，在那时很不简单啊！非常热情。但这时他显然已有很大变化了，为人也没有过去那样机智，同我在1946年时见到的他不大一样了。现在他年纪就更大一些了。

因此，我看了由他口述《地下工作的二十五年》（陈洪进笔录整理）之后，感到许多重要情节他没有讲，党交给他哪些重要任务，他完成了哪些重要任务，哪些是人家普通人做不到的，等等关键的问题他没有说。但我的老朋友陈洪进先生31次去他家中听讲做笔录，整理出的这样一份宝贵资料，我认为是一份重要的党史史料。可是如果作为一个完全不了解他的人要完全看懂这份材料又不大容易。我看了三遍，头一遍，我当做一个不认识他的人



来看，感到不大容易看懂。第二遍，我做为一个比较了解他的人来看，感到许多历史问题他都没说，我所不知道或是知道不全的东西他都没说，于是我慢慢回想了一下，解放后我同他接触多些，因为他有时要我给《中国建设》写英文稿子，与他来往多了，了解的就多了一些。我补充问了他三个问题，所以对他的一些事情还能解释。因此我感到对这份稿子如不加注解，不仔细解释，一般的人就不大容易看懂，不大容易更全面地了解他。所以从第三遍起，我就开始做脚注。将有必要解释的事件，同他来往的人名都做了注释。第三遍看过，脚注做完，我又根据脚注写了一篇读后记。从历史背景，党交给的任务，他完成的任务，以及后来的影响这几个方面，凡有一点关系的我都写进去了。我想，有了这两份东西，再同他讲的联系起来看，也许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他。

今天我主要还是根据他这份东西来讲，不以我的角度来谈他。

为什么他有些事情没讲清楚？因他这个人不爱名利，他怎么认识自己就怎么讲，平铺直叙，一带而过。所以他一上来就讲1915年他去美国留学，进了什么学校，得了什么士什么学位，以后回来做了北大教授。不了解他历史的人实在不大容易弄懂。实际上这里面需要解释的东西不少。他1915年留美是私费留学，是他妈妈卖了自己的首饰，给他凑了2000美金才去的，他的父亲是不赞成的。他最初是想到美国学园艺，是想学会给汁多、皮薄的金山橙育种，而不是学社会科学。他在波莫那大学学习，搞育种要在显微镜下看植物的细胞活动，他高度近视，根本看不清楚，所以他当时理论课学得极好，但操纵显微镜观察细胞活动却搞得很糟，这情形被老教授发现了，“翰笙啊，你理论学得这么好，但观察细胞活动却这么糟，怎么搞的……原来是眼睛不行。这样下去大概不利，还是转系吧”。改学什么呢？当时他想的是科学救国，1915年前后正是崇尚“科学救国”的时代，许多人如李四光等这时都在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于是陈翰笙转到了地质系。“开矿找矿对祖



国有用处，我就改学地质吧”！同样，理论上还是全优，但到野外实地测量，又用到眼睛了，又不行了。一个老教授又来找他，一看还是眼睛不行。自然科学学不下去了，只好转学社会科学，到底学什么好呢？正好这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几年来俄国的革命动荡对陈翰笙影响很大，“我改学历史吧，研究一下社会的变革”。这下选对了。他记忆力特别好，而且外文很好，那时他英、俄、德文都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可以和教师自由地交谈，能看能讲，特别好，加上中文等于有了四门语言。外文成了他钻研历史的工具。所以现在许多搞历史的同志赶不上他，就是因外文基础薄弱，因而困难很大。后来他到芝加哥得硕士学位并不稀奇，他没讲他曾去哈佛学法律，没搞学位。也没讲后来去柏林大学攻博士学位的详细情况。他得柏林大学博士，搞的是六国使节会议瓜分阿尔巴尼亚问题，我问过徐永煊同志，六国使节会议的文件很复杂，起码用了五种文字，所以难度极大，原始资料很厚，换了别人还不大可能消化得了。柏林大学许多人都很佩服他：中国学者这样搞，了不起。他没说清。

接下来，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蔡为什么聘他？当时蔡元培去欧洲旅行，聘请中国学者到北大任教。当时陈翰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欧洲、美国教育出来的欧美型学者，蔡先生聘的是陈翰笙的学问。蔡先生是“有所不为，无所不容”，胡适我要，辜鸿铭、老古董冬烘老先生我要，李大钊要。蔡元培就厉害在这里。他当时欣赏陈翰笙，不是因陈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欣赏陈翰笙的历史学知识实在渊博，外语实在好。“好，你来教历史”。我感到他这点没讲出来，所以加了注解。就是说：陈翰笙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的学问也是够做教授的。

后来他的思想转变，也很有意思，他讲得很少。他说：他和几个苏联朋友来往，其中有一个人向他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两人就常在一起讨论一些社会历史问题，有时谈得晚了，就留在他家中过宿，彻夜讨论。是怎么过宿的呢？那位老兄躺在床上，陈



翰笙躺在地毯上，那时他还年轻，27—28岁。白天看的《资本论》，晚上讨论，哪一章哪一节，甚至到书中的哪页哪行，都能背出来，跟俄国人谈《资本论》，要通晓两个版本才行：要读过德文原版的《资本论》，另外还要看过俄文版的《资本论》，中文版的帮不了忙。俄、德并举，在地毯上聊天，好像咱们中国的闭目下围棋，不用棋盘棋子也可切磋。他谈到《资本论》，认为马克思花了40年的功夫写《资本论》，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确有独到之处，他衷心佩服《资本论》是这样的。于是他对苏联朋友讲：“啊呀！我过去在欧美所学的哪里是历史啊！不过都是些史实的堆砌，《资本论》才是真正的历史啊！”陈翰笙的特点是：肚子里的学问很多，因此他对一种思想认识清楚了，是全面地接受。我在同他聊天时发现，他对《资本论》是真懂，每段内容，他都是消化了的，他用自己的语言解释。他在同苏联朋友的交往当中，把自己在欧美所学的都颠倒了过来，用马克思的观点再来解释历史，是真正的通了。他的思想转变是在有了很雄厚的科学思想根基之后的转变，这同一般的世界观转变是完全不同的，是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在高级知识分子当中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才不是寻常的事情。

思想转变之后，陈翰笙开始同李大钊接近，他们关系很好，李大钊同志的建议他都接受。他一听李大钊同志的话便清楚了李的为人，因为这时的陈翰笙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的特点是弄懂了马上就干，弄懂多少干多少，而且不怕冒险，亲自实践。

以后他又见到了蔡和森同志。蔡和森同他谈了一个晚上。他觉得蔡和森同志很简单。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当中，蔡和森理论水平很高，毛主席都很佩服他。蔡和森向陈翰笙谈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问题，使他很受启发。

在同李大钊、蔡和森同志接触之后，陈翰笙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他看苏联的报纸，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在俄国一国之内率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俄国这



样一个封建帝国产生的原因等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历史现象的产生有清楚的理解。所以后来周总理问他苏联党内情况，政治内幕，他能回答（当时他是外交部顾问）。他还能讲出苏联党内理论斗争的分歧点，托洛斯基与斯大林的斗争以及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这是他的独到之处。

另外，他接受蔡和森的另一影响，是注意中国农村情况。蔡和森向他讲了海陆丰农民运动，澎湃的农村革命实践，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实践。他注意到中国农村的出路是走土地革命的道路。他老人家一辈子研究历史，搞了两大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他抓住了这两点，在学术上也是独到的。

早期，我同冀朝鼎也很熟悉，感到在这些方面，冀不如他深刻。

陈翰笙同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相识之后，加拉罕要他写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内幕，给共产国际的英文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由于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得十分彻底，所以往往是他写什么就登什么，一字不改、原文照录。早年他写的中国通讯反映了当时他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了解，反映了他的观点（这些英文稿子大概登在1925—1927年间的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上），写得很成功，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了解多是从他的这些文稿中分析得来的。陈翰老的这些功绩在他老人家自己的口述中仅用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一带而过，所以如不认真地研究、分析，是无法了解他所做出的贡献的。

（我在这里作了一个脚注）

1930年前后，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登载过史沫特莱写的中国通讯，史沫特莱怎么会对中国社会的内幕、政治动向，分析得这样透彻？这里面也有陈翰老做的工作。史沫特莱与他关系很好，两人无话不谈。史沫特莱的德文原稿都经陈翰老过目，由他修改。所以1930—1932年前后《法兰克福日报》上史沫特莱的中国通讯也反映了陈翰笙的政治见解，他对形势的分析也反映出他从实际



出发、不从教条出发的又一特点。

陈翰笙对李大钊同志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对李大钊同志的指示坚决服从。李大钊同志曾指示他做好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先从左派做起。同时也不要疏远右派。最早，他先接近蔡元培，以后是陈友仁、宋庆龄、邓演达、杨杏佛、何香凝、冯玉祥、王昆仑，他同他们保持来往，关系很好。国民党左派形成了一个集团，他在其中十分活跃。在这些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一般人是无法起作用的，他是以自己的教授身份和渊博的学识，穿插其间，发挥作用。

按照李大钊同志的指示，他同国民党右派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现代评论派的王世杰、陈西滢，改组派的陈公博、顾孟余、唐友壬，CC派的朱家骅，等等。

《现代评论》上他也写文章。以致鲁迅先生在同陈西滢等人的笔战中误会了，连带着把他也骂了进去。

搞农村调查经费不足，他找到顾孟余，顾给他挂了个“铁道部顾问”的头衔，除他当时的月薪400元之数又给了他一份薪水，他将这笔钱一文不留地统统拿出来办了剪报。人家是公私不分，揩公家油；他老人家也是公私不分，揩私人的油。

他始终同这些右派人物保持着来往，一直未被人察觉。

从现代评论派到改组派，都带有反蒋情绪，他们把蒋政权的内幕，一些最机密的东西透露给陈翰笙。陈翰笙从中分析动向，整理成资料送交共产国际（到上海后，他已不大给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写稿）。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很得力于他。

这些又是冀朝鼎不及他之处。

总之，从国民党左派到右派他都交往，保持了很广泛的联系。

30年代中期，他又搞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500个会员。这在当时是极为了不起的，带出了一批人才，如：王寅生、张锡昌、薛暮桥、钱俊瑞、狄超白、孙冶方、秦柳方、张稼夫，我所熟悉的就有20—30个。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多是他的学生。像薛



暮桥同志对他一直是以先生相称的。“文化大革命”中诬蔑30年代有一条经济黑线，他们倒的确是在一条战线上。

在蔡元培、宋庆龄的支持下搞农村经济调查，是他在30年代做的头一件大事。

毛主席的著作中提到：“当时国民党‘剿共’之所以剿了那么多年，与上海文化界开辟了另一战场有很大关系。”在这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中，也有陈翰笙的一定功劳。

第二件大事就是他在上海和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杨杏佛、茅盾一道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自己忘了，口述中未提到，但实际上名单是有他的。（上海出版。周天度著《蔡元培传》第317页：“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会员名单中有他。）

上面提到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和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他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表现最为活跃的两件大事。

他提到了那时和鲁迅先生的会面。他对鲁迅先生讲：我就是陈西滢说的那位“吾家世兄”，鲁迅先生哈哈大笑。从那以后，他们同蔡、宋、杨等人一起在上海做了许多工作。

后面他又提到流亡，在上海无法存身，只好又流亡国外。流亡的过程惊心动魄，印象很深，所以讲到了。但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流亡国外做的很多工作，影响很大。当时在太平洋学会中有胡适、冀朝鼎、陈翰笙等很多中国人，但名堂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冀朝鼎与陈翰笙。他们一方面为“三S”即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提供材料写文章。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太平洋学会中的活动影响了一大批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其中最重要的即欧文·拉铁摩尔。此人是美国民主党政府罗斯福总统的智囊，后曾派往中国任蒋介石的总顾问。蒋介石没重用他，但罗斯福对他却是言听计从。我1979年去美，还听到一些人讲：美国损失中国，事情坏在一派学者身上，他们是一种思潮，根子是翰笙。

在太平洋学会里，胡适在冀朝鼎、陈翰笙面前是抬不起头的。他们两人学问好，学术地位比胡适高，说起话来就响亮，影响也



大。拉铁摩尔听他们的话，因而带动了一批美国人，一批跟拉铁摩尔走的人。1979年我们跟宦乡同志一起去美国，一些洋人和我们来往，说：“当时就是你们陈翰笙讲的嘛，说中国共产党没什么可怕，他们是主张土地革命的，资本主义不也主张土地革命嘛？反对封建嘛！”好处就在这里，他以开明学者的身份出现，始终不出圈，人家都很相信：“陈翰笙都这样说嘛！没有什么，这是受美国教育的学者嘛。”当年李大钊同志指示他：你以开明学者的身份出现，公开活动，同时做些秘密的情报工作。他始终是以这样的身份出现的。他到处去宣传，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去做报告，到普林斯顿大学——一所很高级的学府去做报告，到霍普金斯亚洲研究机构去做报告，他是公开的去进行国际宣传，也不用稿子，上去就直接用英文讲，人家是很信服他的。所以当年的陈翰笙可不是现在的陈翰笙。现在年纪大了，年轻时可是机智得很呢。太平洋学会的事他提了，但关键是他在太平洋学会中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1939年、1940年、1941年间，他在香港，做了两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是在英文的《远东通讯》上，最早将“皖南事变”、新四军遭伏击的消息向国际上公布出去，这次事变的英文消息是由他第一个向外宣传出去的。当时他未接到任何指示，他以特有的敏感，立即写成稿件，由夫人顾淑型打字，在《远东通讯》上发表。顿时，国际舆论哗然。他的策略十分巧妙，以民主的口气，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当时国际间反法西斯已成潮流，他以一个中立学者的身份，批评国民党的法西斯行为，点出他们残害抗日反法西斯的力量，引起了国际上对国民党此举的抨击。所以后来叶挺在见到他时亲自向他致谢。

第二件就是在香港搞“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直接向延安和其他地区提供了1800万美元，延安由李富春同志签收了。当时，“工合”的中国委员会控制在孔祥熙手中，他们搞“工合”的国际委员会，就是摆脱孔祥熙的控制。有宋庆龄、斯诺、艾黎，还



有英国的何明华，何明华是英国及香港的主教，经过宋庆龄的活动把他拉了进来，工作有了担保。他们筹到款后，通过廖承志的一个亲戚直接汇到延安，绕过了重庆。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如果被重庆方面知道了，是会被扣住的。这些奥妙他都没讲出来。

香港沦陷后，陈翰笙逃难到了桂林。他在桂林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向外国记者公布了廖承志被蒋介石秘密逮捕的消息。这件事他干得非常巧妙，他以中立学者的身份把消息捅了出来。事先他考虑了策略，消息传出后，会由何香凝、宋庆龄出面交涉要人，不必用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样有利。事后何香凝非常感激，连夜画了一树老梅送给陈翰老。他很巧妙地救出廖承志同志，不然廖承志同志是很危险的。

这件事翰老自己没有提到，我猜想他一定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他不居功，也不写。这件事应该写上，很重要。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是由他和李亚群同志一同搞起来的。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与中共广西省委没有横向的联系。它的范围超出了广西，是以桂林命名但实际负责湖南、江西南部、广东一部分及广西等地工作的机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张锡昌等人也在其中工作。陈翰笙同李亚群是单独联系，在野外的小树林中会面。

重庆军委会要逮捕他。事因时间久了，香港事发，太平洋学会事发，沿路的帐算下来，使国民党觉察出一点名堂，所以军委会电令李济深抓他。但李济深要陈此生悄悄通知了他，他便利用与英国人的关系逃亡到了印度。

1945年他在印度，就住在英军系统一个铅皮搭的临时棚屋中，当地人称这种小棚为“板加罗”。屋子很矮小，高一点的人要弯着腰才能进去。印度气温很高，11、12月还要住在室外，他却若无其事地一头钻在里面研究英国皇家学会对印度的大事调查。这是一套14巨册的大书，他花了两年功夫把它看完了，写了一本



《南亚经济地理》。我在美国看了这本书，学术价值很高。1980年前后，印度又重新出版了这部著作。他不光看书，还亲自外出调查，把印度、巴基斯坦分成21个经济区，他把印度的经济地理、社会背景、种姓制度等都研究得很透。他付出了很艰巨的劳动，当时印度很热，我去时已经11月了，但穿着单衣还嫌热。真不知他是怎样过来的。问他，他也不讲。顾先生气得要命，住在哪里不行？偏要住在这个小棚子里，澡也不能洗。顾先生说 he 捂了一身痱子，但还在看书，叫他停一会儿都不听。他的学术地位很高，印度的许多学者都很买帐。当时国大党中有名的学者马哈拉·卢比斯对他很佩服，说什么是什么。尼赫鲁也很佩服他。尼赫鲁是很有口才和学问的。1955年陈翰笙随宋庆龄去印度访问，尼赫鲁亲自接待，宋庆龄、陈翰笙夫妇住在他家中，尼赫鲁带着一条猎狗常与翰笙散步，那时甘地夫人很年青不大说话，她的两个男孩还很小。

1946年他去了美国。日本已经投降，这时美国实际上已把中国当作了自己的殖民地。他到处公开演讲，从西部的华盛顿、旧金山，到中部的芝加哥，东部的纽约，大声疾呼：美国政府如果援蒋反共就是走进了死胡同，就是同全国人民为敌。在中国搞土地革命，打倒蒋介石是人人赞成，我陈翰笙也是赞成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小知识分子都是赞成的。他的演讲在当时影响很大。文幼章、斯特朗、斯诺都引用他的话公开演说反蒋，尤其是文幼章在华盛顿一边讲一边拍桌子，非常激昂。他们的舆论造成了一种气氛，逼得杜鲁门等人在对华政策上不敢随便行事。1979年，我同赵复三、钱钟书、费孝通一起去美，有些熟悉的像费正清等还说：“我们的罗斯福总统糊涂，听了你们陈翰笙的，结果把中国搞丢了。”这当然是些反共的流言蜚语，但从反面可以看出陈翰笙所起的作用。对他在国际宣传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他没讲，我认为他在国际宣传工作上是很有一套的，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时我们在美国有个座谈会叫



星五座谈会。后来周总理对杨刚讲：“你们这是哪一级组织啊？你们要正式命名，就叫‘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人员有徐永煊、唐明照、徐鸣、龚普生、浦寿昌、杨刚、赖亚力、我，我们七八个人。我去得最晚。1946、1947、1948年我们工作开展得最全面，但有时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动态摸不准，有时遇到非常难做的题目，就去找陈翰笙，他那时机灵得很，从不随便松口，去打个电话，或者出去跑上两三天，很快消息就回来了。他在美国上层社会，高级知识分子中路路通。所以徐永煊同志说：“我们没办法，我们在美国二三十年了，也不如他。”还有唐明照同志，是长期在国外的老华侨了，也比不上他。

冯玉祥去美国，见马歇尔，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谈些什么话，由谁做翻译，发表什么文章，我们在美工作小组都是研究了。对可能出漏洞的地方我们都做了应付的准备，一直是由浦寿昌同志做翻译陪着的。章汉夫同志远在香港，因为不大清楚这里的情况，所以来信表示不同意冯玉祥去见马歇尔，担心冯玉祥与马歇尔联络搞第三势力。在这个问题上陈翰笙的意见是对的。冯可以去，因为他与马歇尔是老朋友，到了华盛顿，应该做个礼节性拜访。他真正的目的是去见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商量搭乘苏联货船回解放区。陈翰笙当时与杨刚同志分析了情况，认为可以去，还有浦寿昌同志陪同做翻译嘛！

冯玉祥当时在美国的表现是很好的。他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分析是听取了陈翰笙的意见的。陈翰笙跑去见冯玉祥，前前后后的一讲，只几分钟时间，冯先生即表示说：我相信你的，我明白了。

更有意思的是做王昆仑的工作。王昆仑当时也在美国，在纽约。王昆仑当时思想很复杂，许多想法理不清。后来陈翰笙跑来了。因王昆仑是我表兄，所以我常住在他家，这经过我是看到了的。一说陈翰笙来了，王昆仑便介绍说：这是我们北大有名的“娃娃教授”啊，这可是权威人士。他的意见可要认真听听，葆鼎啊，你帮我好好听听啊！陈翰笙当时很简捷：国际形势应如何分



析，国内形势应如何分析，你应该怎么办，我替你打算，你最好如何如何，你尽快回国，越快越好！几句话简单明了。王昆仑一听，非常信服，当即下了决心。送走陈翰笙后，王昆仑和我聊天：“你看，陈翰笙都这样讲了，我还犹豫什么。”王昆仑也是很早就与我党有联系的，但到了美国这个社会之后，各种形势这样复杂，他担心会不会出现其它变化，有些举棋不定。当时很乱，宋子文有活动，李汉魂也有活动。让人摸不清。当时我们很多人都给王昆仑做了工作。唐明照向王昆仑打了招呼，但不解决问题。我也一直在做他的工作，对我这个老表弟的话，王昆仑还是相信的，但总归还是有些疑虑。陈翰笙的话一讲，行了，王昆仑很信服，回国。

还有一件事值得讲一讲，陈翰笙当时是可以不回国的。留在国外当名教授，过好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顾淑型当时搞摄影，还想在国外多学一些。但这时周总理发来电报，请陈翰笙回来，协助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一接到周总理的电报，他立即动身，周围的一些国际友人都不赞成他回来，夫人顾淑型因打算继续学习，也不同意。但陈翰笙克服了一切阻力，包括家庭里的阻力，立刻回国了。他在口述中只说了回来的经过，怎样经过英国、波兰、苏联等等，没讲这些情况。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陈翰笙以开明学者的身份出现，公开活动，为党做国际宣传工作，兼带秘密地搜集情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起到了一般人无法起到的作用。据我所知，我们中国学者能够在国外产生影响，起到重大作用并得到外国人钦佩的，只有两个人：就是冀朝鼎和陈翰笙。两人发挥影响的方式都很有意思。冀朝鼎发挥很大的作用，是因为：孔祥熙怕美国人，要拍美国的马屁，而美国人则拼命拍冀朝鼎，因而孔祥熙也来拼命拍冀朝鼎。而陈翰笙的情况也与之异曲同工：美国民主党政府听欧文·拉铁摩尔的，拉铁摩尔则听陈翰笙的，陈翰笙的言论因而便影响美国的政策。这两个学者都是很了不起的。冀朝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很厉害。陈翰笙是柏林大学博士，更硬！他们都发



挥了很大的作用。

陈翰笙的文集在1985年之内将由复旦大学出版。文集中他的著作收得较全，要了解他学术方面的活动和成就，看文集就可以了。但要了解他的革命活动，他为党所做的工作，则需要认真地补充。所以除脚注外，我还写了一份《地下工作二十五年》的读后记，把一些突出的问题再说一下，可能会对了解他的情况有些帮助。

另外有一件事情需要特别提一下：《邓小平文选》出版后，他请家人为他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然后自己摸索着为邓选写了一份索引。这份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展望出版社曾打印出来供大家学习《邓小平文选》参考。我们眼睛正常的人都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他对《邓小平选集》是由衷地佩服：“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最近《周恩来选集》出版，他也抱有同感。他这个人从不说假话，他对当前的党中央是发自内心地信报。

他生活俭朴，从不要求享受。好生活他是过过的，但现在生活很简单。几十年前，他同斯诺见面时，斯诺匆匆忙忙错穿了他的大衣，斯诺的那件旧大衣他一直穿在身上。前两年见他那件大衣实在破了，简直不像样子，劝他换一件。他却说：“斯诺是我的老朋友了，穿着做个纪念吧！”

现在年纪这么大了，眼睛又不好，但还是一天忙碌不停，还办着三个英文班。有时，我们在星期天去看他，也经常见他在忙碌着。一些素不相识的客人找上门来，他也热情地予以接待。

今年是陈翰老思想转变、正式为党工作的60周年。对这位为党做过许多工作，有过很大贡献的老人，我们应当好好地纪念一下。



陈翰笙诗选

开伯尔山口之游

1945年12月，印度史学会在白沙瓦开年会。余与德里大学史学系主任寇来希教授一同出席。会后，同游阿富汗边境开伯尔山口。在山口中乘火车一小时半。次日作诗一首。

陆行铁轨似长蛇，
轰轰列车近朝霞。
一片青苍夺我目，
几阵香袭是野花。
流水潺潺急如呼，
丘陵叠叠无坦途。
此去迫近喀布尔，
林鸟亦唱普什图。
八十年前称险隘，
英俄对峙分胜败。
为防南下哥萨克，
五里一库储军械。
埋弹如瓮存库前，
备创敌人山口边。
于今火箭飞万里，
俯笑地雷今长眠。

1945年12月21日



庚子冬初雪

1960年11月23日北京大雪，深二寸以上。

凉风一夜袭京都，
北海景山成画图。
雪压红墙官禁冷，
翩飞惟有鸟相呼。

1960年11月24日

忆亡友焦墨筠

墨筠与我同年生，1917年至192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波莫纳学院同学。当时众称翰墨有缘。1934年春其母逝世，适我在青岛参加丧礼。次日与墨筠游青岛公园，后即分手。1956年春其子费筱墨来上海报母丧。

勤工俭学士无多，
海外三年共切磋。
记否金门倾肺腑，
夕阳惊叹起沧波。
沧桑世变不恒久，
翰墨因缘传众口。
青岛离筵判死生，
九原犹忆同心友。

1960年12月17日

贺淑型被选为三八红旗手

吾妻顾淑型，一生努力于美术，解放初年在新华通讯社摄影部工作，1957年改就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兼该会服务部主任。



1960年为庆祝三八妇女节被“全国妇女联合会”选为全国6000名“三八红旗手”之一。兹作歌行以贺之。

寿逾花甲敢任事，
家庭社会一身治。
敏捷犹似冠笄年，
好义急公立远志。
写生妙笔挥兰竹，
摄影导人街教育。
博得三八红旗手，
展览名作幅有九。
男有显爵勋光禄，
君非大夫亦能为民造洪福。

1960年12月31日

纪念我乡无锡三大画家：顾恺之、倪瓒、王绶

1961年4—5月，北京故宫中皇极殿和宁寿殿举办纪念中国古代十大画家展览会。我与淑型去参观，次日吟此诗。

十大画家遗轴展，
天机心匠盈古殿。
东晋元明三代间，
锡山三杰人人羨。
恺之真迹久失传，
洛神列女存摹本。
唐宋摹本具精神，
星眸赤眉了无损。
云林山水世无双，
曾与王绶同绘像。



独作古木幽篁图，
自题诗句何高昶：
“古木幽篁寂寞滨，
斑斑藓石翠含春。
自知不入时人眼，
画与蛟溪古逸民。”
王绶诗笔光文苑，
友石全集明本传。
小景挥毫仿云林，
画竹超然独步稳。
古来高士善写真，
构图运笔几番新。
太息吾身生也晚，
不得亲承前辈人。

1961年4月10日

游雁荡山

怪石奇峰腾碧天，
三簾瀑布动心弦。
灵岩古刹邀明月，
素娥云开雁荡妍。

1962年1月23日

题黄翔先生摄漓江风景

近水远山怡我情，
漓江浩荡喜澄清。
竹摇凤尾盈隄岸，
舟子高歌耳畔鸣。

1962年2月2日



山海关

步上秦城云彩多，
关楼俯瞰一池荷。
于今险阻失依据，
一片汪洋只见禾。

1962年8月5日

伤杨刚自尽

耿介杨刚信可怜，
横遭物忌赴黄泉。
黄泉果比人间好？
未必魑魅能容贤。

1962年

六十七初度感赋

生死岂自觉，
世情已饱尝。
努力有时尽，
得失理无常。
人生赖群众，
前进意味长。
宏图诚可望，
文明事业昌。

1963年2月5日

哭至友冀朝鼎同志

豪迈如君我素知，
平生离别杳难支。



平生遗业犹宏远，
吾党绸缪事不迟。

1963年8月10日

宋庆龄副主席折骨后静养，赋诗慰问

五十年来常触邪，
风霜受尽为国家。
扞天挠骨折复续，
松柏坚贞誉有加。

1963年12月28日

无 题

久无竹林交，
安心伏书巢。
紫花掩青藤，
满院呈绿苞。
书诗信可求，
一散平生愁。
俯仰蜗牛舍，
已倦四海游。

1963年

井冈山

杉木满山银杏黄，
巍巍五哨敌难当。
于今四海来宾客，
赞我军谋誉孔彰。

1963年



偕世界史研究所同仁作香山春游

良朋携手作春游，
回首云烟四十秋。
旧雨渐稀闲地少，
花开桃李壮诗眸。

1964年5月6日

初夏读诗

天蓝叶绿浴骄阳，
芍药太平一院香。
乘兴朗吟工部句，
东华门外亦仙乡。

注：“太平”为木本花名，其色白，清香蔼蔼。

1965年5月29日

游北海公园琼岛观菊花展览

一瓣一花同一心，
傲霜朵朵动人吟。
且看琼岛悬崖菊，
菊塔不忧白塔侵。

1964年

念母

无锡东门城头街，
祖传茅屋遗三栋。
家离东林半里许，
忆我慈母劳接送。
我父远游湘鄂黔，
幸赖高堂管教严。



备课修身两不误，
时时苦语作针砭。
教我为人不爱钱，
处世应须穷益坚。
勤俭之风宜培养，
见义勇为担铁肩。
于今望七虔追思，
萱闱遗训注心田。

1965年8月21日

游太原晋祠

二月春光柳暗催，
稻花未放荷花开。
晋水盈池存温度，
宋殿唐碑引客来。

1966年2月18日

月夜

柳絮飘飘癫且狂，
今宵月色满银床。
追思故旧不成寐，
一夜风高荡我肠。

1966年5月6日

忆亡友高君仁山

革命捐躯何壮烈，
卅八年前已永别。
容貌声音如昨日，
萦绕我心犹未灭。



佳儿高陶土木工，
寄居沈阳音尘绝。
卧佛寺侧扫君墓，
翠柏两行饱冰雪。
青莹云气横古今，
表我友情胜碑碣。

1966年6月18日

昙花

梵语优昙花，
德干高原花。
汉唐传华北，
僧俗咸宠嘉。
青叶如宝剑，
两刃呈齿牙。
白瓣黄昏开，
艳艳叶上葩。
馥郁如檀香，
似无毫厘差。
须臾即谢去，
仿佛见落霞。
混沌一宇宙，
吾生亦有涯。
人寿虽过隙，
辈出革命家。

1966年7月9日



人生三乐

坚强精力能劳动，
敏捷文思如泉涌。
切磋良友得益多，
人生如此不懵懂。

1966年9月19日

寄素雅胞妹

春鸟嘤嘤鸣，
依依手足情。
同看一轮月，
书札宜相迎。

1967年2月5日

七一自述

弱冠海外游，
史学勤进修。
吾年二十七，
讲授登红楼。
黄浦军北伐，
有事于田畴。
调研系农村，
良为土改谋。
解放建国后，
驰驱外事投。
人寿岂无涯，
夕阳忽西流。
古稀今幸健，
浮云且暂留。



劳劳可怜虫，
行路怀死忧。

1967年2月

除夕有感

落落终身晚节坚，
新功未立自矜怜。
旧游惜已成隔世，
瞥眼韶光又一年。

1967年

北京季夏

暑伏刚逢雨季来，
低云重压苦黄梅。
蝉声四起齐聒耳，
扰我心灵心不灰。

1967年

读白居易诗

诗意如橄榄，
诗辞何恬淡。
悠然令我思，
句句能生感。
中唐白香山，
今日复震撼。

1967年8月14日



东华门寓所摘取葡萄

仰视秋云高，
累累摘葡萄。
葡萄润口舌，
手足念勤劳。

1967年9月10日

抒怀

壮志不因忧患移，
闲身自检悔前非。
残年倘许承新命，
业业竞竞效一挥。

1967年11月10日

北京初降雪

当街黄叶如铺沙，
残雪枝头似著花。
如絮今年飞降早，
孤烟起处几人家。

1967年11月11日

悼美国记者斯特朗

卓卓安娜路易斯，
终身宣传革命史。
远游先至莫斯科，
转入北京已暮齿。
面如红霞发如雪，
联编通讯凭打字。
旅寓访君宾客多，



对客谈笑清风起。
安娜通讯列专栏，
反动读之哪得安。
报导新闻握全盘，
革命者流心殊宽。
痛斥敌人逞傲慢，
安娜义气鹏搏般。
淑人不寿诚可叹，
朝野同悲设祭坛。
无数花环绕遗像，
哭君顿觉春风寒。
魂归故国程遥远，
茫茫洋海壮波澜。

1970年4月4日

追念淑型

水影山光惹慕思，
旁人冷眼笑我痴。
琴声隐约何人作，
五十年华不可追。

1970年6月15日

一九七〇年中秋夜

我似浮云滞茶陵，
愁心一片有谁矜？
今宵明月照京沪，
好把心潮寄友朋。

1970年9月20日



改 造

窗前墙下废铁堆，
氧化多年吸尘埃。
除锈加工投烈火，
钢材跃出不可摧。

1970年12月16日

湘东铁路建筑中

涑江流水声潺潺，
两岸民工总未闲。
双手填平百丈谷，
一肩挑走万重山。
苦力当年失业愁，
翻身今日铁路修。
崭新社会真优越，
生产飞腾仗远谋。

1971年1月4日

咏卷心菜

绿叶如花四面摊，
遥看排列翡翠盘。
晴氛笼罩菜畦上，
秀色宜人众所欢。

1971年2月5日

咏紫云英

绿肥密植宛如秧，
极目紫云十里长。



惹得翔飞蜂酿蜜，
鲜花凝泥稻芒香。

1971年3月30日

豆夹丰收

豆夹层层绿叶丛，
眼花缭乱庆年丰。
一盆采满才三步，
回首长茎招暖风。

1971年7月29日

哭亡妻顾氏淑型

1962年我与淑型同游富春江，在桐庐途中嘱彼病故后将其骨灰投入风景美丽的江面。六八年十一月五日因得癌症逝世。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我与素雅和炳宏于桐庐的窄溪地方践我诺言，专题此四句以志哀悼。

浩荡窄溪送骨灰，
凄凄水上我徘徊。
何时物化应作伴，
携手夜台笑语陪。

1972年1月23日

游杭州西湖漫赋

阳春未到杭州来，
目击茶花孤岭开。
映月三潭慰闲散，
观鱼花港几徘徊。
如此名湖越景胜，



神京北望仰琼台。

1972年1月28日

追忆陈毅同志

将军突然仙化
临丧我泪如泻。
噩耗中外皆惊，
悼词已满天下。
生前骂贼频频，
祭奠主席躬亲。

1972年2月15日

虎丘览古

云岩七级古塔新，
朵朵梅花报初春。
结合劳逸存雅兴，
三千一日计游人。

1972年3月5日

送春辞

年年送春归，
日日催人老。
何用惜花飞，
早须除蔓草。
蔓草如不除，
百花难再好。

1972年3月20日



摄影自题

吾心可凝丹，
持节能耐寒。
胜地都游遍，
吟诗倾肺肝。

1972年4月2日

北京前门外售票处

人多屋小竟入围，
窗外尘埃蔽朝晖。
举目一窥何所见，
群儿依母地相随。
娘儿买得火车票，
半日排队腹已枵。
吁嗟旅行真不易，
谁云买票无牢骚。

1972年8月6日

惜材

山海关外长白山，
古木参天不可攀。
樵夫挥刀妄采伐，
良材毁去岂能还。
多少栋梁不起运，
只缘输运有难关。
弃我良材取朽木，
庸人临事何冥顽。

1972年8月8日



傍晚散步

东华门外月高清，
一路河边风送迎。
树上鸣蝉响不绝，
炎凉人世那关情。

1972年8月19日

自述

曾揭彭述之背叛，
屡防饶漱石翻案。
奉命海外奔西东，
当年为党流热汗。
而今幽居东华门，
岂能长此成闲散。
幸能授课教后生，
年老不甘作懒汉。

1972年9月1日

秋日书怀

仰望庭中月，
秋风扫葵叶。
所思惜永别，
箏声久已绝。
物情常变态，
允宜取和协。
求知当宏硕，
无心争显赫。
处世贵明哲，



翼翼保晚节。

1972年9月10日

国庆节晚餐即席赠张香山

香山济世才，
伴送田中回。
喜逢国庆日，
亲旧邀同陪。
美酒丁香酿，
尽兴挥几杯。
交欢不嫌暂，
风雨岂能摧。

1972年10月1日

新居

新居怜我影，
墙花有金银。
庭中望秋月，
空忆顾淑型。
暮年赋闲散，
尤未达耄龄。
何时投窄溪，
应不感伶仃。

1972年10月5日

冬望

独有闲散人，
偏惊物候新。
清晨信步出，



落叶如飞尘。
静夜倚高枕，
虫声何沉沦。
阳春今未煦，
赋诗幽意申。

1972年11月30日

书怀邹容

落落何人报大仇？
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
几个男儿非马牛。

重游黄山

今日重来登黄山，
只缘复旦暑假闲。
临高俯视千峰仞，
怪石奇松景自颁。
排云亭旁岩摩天，
爬上莲花看云烟。
奇观胜游出望外，
我同素雅笑拍肩。

卫生之道

基本吃素，
勿忘走路。
心情舒畅，
劳逸适度。



七八年八月初至北戴河避暑一周

淼淼烟涛北戴河，
纳凉避暑旅人多。
朝看旭日东方涌，
夕听新声渔父歌。
千百职工休养来，
鱼虾兼味快衔杯。
沙丘三十年前事，
今日园花烂漫开。